

打出機會

原住民成為棒球選手的社會流動和訓練體制*

林文蘭**

Contest Mobility

An Essay on the Social Mobility and Disciplinary Regime
of Indigenous Baseball Players

by Wen-Lan LIN

關鍵詞：社會流動、訓練體制、競賽遊戲、苦練意識、階序意識

Keywords: social mobility, disciplinary regime, athletic games, consciousness of hard disciplinary practices, hierarchical consciousness

收稿日期：2011年9月20日；接受日期：2012年11月5日。

Received: September 20, 2011; in revised form: November 5, 2012.

*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精闢的修改建議。本文研究經費來自下列獎助：2007年國科會獎勵人社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獎助(NSC96-2420-H-002-022-DR)、2008年中研院社會所博士培育計畫、2009年中研院民族所博士培育計畫。本文孕育於中研院Seminar Synergy工作坊，特別感謝吳宗昇教授和顧彩璇提供腦力激盪。本文改寫自博士論文第五章，感謝博論口委(謝國雄教授、章英華教授、黃宣衛教授、王甫昌教授、蔡瑞明教授)的悉心引導。本文初稿〈紅土工廠〉發表於2009年台灣社會學年會，感謝主持人蔡友月教授、評論人王甫昌教授、與會提問人劉昌德教授、李宜澤、林冠年提供啟發性的建議。本文曾受惠於許多系所師生在演講交流的建議，分別要感謝：清大社會所、東海社會系、中山社會系、中研院民族所、交大社文所、陽明通識中心、清大學科所、政大新聞所。我也要特別感謝張晉芬教授、湯志傑教授、李令儀、高惠椿、徐蓓婕，謝謝她／他們慷慨地提供改寫建議和協助。最後，衷心感謝所有的田野報導人，你們深刻的生命經驗是滋養這篇論文最重要的泉源！

** 服務單位：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與人文社會科學院學士班

通訊地址：300新竹市光復路二段101號

E-mail: wenlan@mx.nthu.edu.tw

摘要

為什麼原住民會去追求職棒選手這種生涯短暫的工作？本文分析原住民取得職棒工作的前置訓練過程和運動機會結構的流動歷程。針對台東原住民基層球隊進行九個月的參與觀察，訪談76位報導人，分析球員訓練日記，檢視球員的訓練軌跡、運動社會化、競賽遊戲與文化、意識形態的監管機制，勾繪原住民為何樂於擁抱隱形產出和不確定報酬的棒球訓練，從而打造自我剝削和規訓的苦練意識。研究發現原住民落入變形化的受教處境，在追求績效和競爭求存的過程中，球場不僅是運動專業化的所在，更是球員經歷、回應、抵抗甚至肯認階序意識的競技場。此外，在地位取得更呈現兩種特殊樣貌—邁向專業化之路、受限的替代出路。成功案例晉身職棒，塑造社會流動的開放假象，造就原住民運動成就的自我認同與社會形象，更遭逢短暫職涯和離職之困。效忠訓練體制的規則，對敗退者亦發揮社會控制的力量，模塑其自我說服的心理機轉，提供社會不平等現狀的解釋正當性。直言之，原住民球員的社會流動機會被綁縛在訓練體制所形塑的階序意識、運動升遷空缺鏈和短暫職涯的風險中。打棒球造成原住民在教育與謀職選擇的類聚趨勢與社會堆疊效果，更建構出原住民競爭有限空缺的淘汰鏈。

Abstract

Why do the indigenous peoples aspire to become professional baseball players? a career that is so shor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disciplinary process and the social mobility through the sport opportunity structure that indigenous adolescents must undergo beginning professional careers. Through nine months of ethnographic observation, this study observed the indigenous players' regular training processes and competitions. These observations were also accompanied with the players' training diarie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76 informants.

By examining the space-time trajectories and sport socialization in their training process, as well as examining disciplinary process, athletic games and culture, and surveillance mechanisms regarding their mental and ideological states, the reasons why they enthusiastically embrace the intangible output and uncertain reward of baseball training and why they consciously cultivate a sense of self-exploitation and hard practice can be discovere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were obtained: Indigenous baseball players have come up through a nonstandard educational situation and therefore possess a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mentality. Under this formation of their dispositions and through competing for survival, the baseball field is not simply a place that these indigenous players learn athletic socialization and professionalism. It also becomes an arena where these athletes experience, react to, resist and recognize conventional hierarchical consciousness. Moreover, the indigenous players show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mobility differentiation-pursuing the professional baseball career, but with limited alternative opportunities. The comparatively higher ratio of successful cases of indigenous players advancing to professional baseball careers represents the false illusions of the social mobility attainable through this sport, and produces a sport where indigenous peoples find self-identity and where a social image about indigenous sport achievement is presented, while enhancing social control on the unsuccessful cases and providing them with the justification and mental rationalization of the idea of social inequality. In a nutshell, the social mobility of indigenous players are limited by the hierarchical consciousness resulting from the disciplinary regime, the opportunities available in the chain of advancement in the sport, and the risk of a short-period professional career. Besides creating an occupational homogeneity of ethnic trend and social stacking effects amongst indigenous peoples in regard to their educational choices and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playing baseball also becomes a chain of survival or elimination-for indigenous peoples as they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for limited opportunities.



HyWeb

一、前言

臺灣的棒球運動發展已逾百年，既有研究指出它是不同歷史階段的各種社會力量辯證發展的結果，亦是維繫政權的關鍵(梁淑玲 1993；林琪雯 1995)，甚至是一種具有高度社會性的運動和彰顯男性氣概的場域(林冠年 2010；甘允良 2010)。從殖民現代性的觀點來看，臺灣人的棒球認同體現出對抗或崇愛日本人的情結，填補七〇年代外交困境下的國族認同需求(張力可 1999, 2000)，更打造出國族主義與自我定義的投射(Morris 2004)。然而，球員所面對的運動培訓體制、職棒勞動體制、生涯困境和流動機會，卻是政治視野底下難以被忽視的議題(黃郁芳 2012；蔡侑霖 2003, 2005；邱韋誠 2003；郭振生 2009)。

在臺灣棒球發展史中，日治的高砂棒球隊、嘉義農校及戰後的紅葉少棒和高比例的原住民職棒球員，¹吸引社會關注的焦點，更令人好奇原住民投入棒球之謎。聚焦在花東原住民球員的研究，發現阿美族因身材高大、經濟弱勢和在地工作機會稀少從而追求職棒工作(林伯修、朱自敏 2009)。亦即，原住民透過打棒球扭轉所處的社經弱勢，追求向上流動的機會。但如此的觀點忽略棒球運動的訓練特質，亦未釐清運動機會結構的稀少性，也未反省原住民高比例的棒球參與所帶來的社會效應。

本文探究為什麼原住民會去追求職棒選手這種生涯短暫的工作？在運動專業化歷程中，職前訓練是必經之路，但運動養成過程在既有研究卻罕被關注。本文先勾勒原住民為什麼會去打球的既有解釋，描繪棒球運動機會結構的發展與限制，聚焦在原住民取得職棒工作前的訓練歷程，得以釐清原住民為何擁抱艱苦的棒球訓練，又造成什麼後果。

1 原住民占全台人口的百分之二，但職棒元年(1990年)職棒球員的原住民比例佔二成五，職棒二十年(2009年)更逾四成二。其中阿美族占全台原住民的三成五，但阿美族職棒球員占原住民職棒球員的比例卻逾八成(《自由時報》2007年3月13日；中華職棒 2009)。

二、文獻回顧與評述

(一) 為什麼原住民會去打球

針對「為什麼原住民會去打球」的既有解釋可綜述為四個向度，亦映現出特定的社會觀點(林文蘭 2007b)。

1. 基因體質說

觀點一：原住民天生就會打球？

針對原住民運動表現的研究多關注在生物性因素。能高團的江口團長曾指出：

蕃人的身體運動能力非常優秀，因為他們小時候就有用投石來打鳥類的風俗習慣，加上他們跑壘速度快，這種敏捷的動作也是內地人(日本人)選手所不及的。(蔡宗信 1991：109)

此種體質觀也反映在運動生理學的研究，主張原住民的體適能和基因與漢人有顯著差異(洪偉欽 2007)；²原住民戰鬥意志和抗壓性較高，肌肉群較長，身體結構導致肌耐力和消化訓練量的體能較優，運動天賦奠定其擅打棒球的關鍵(高正源 1995b；邱韻竹 2008)。此類近似生物決定的觀點指出原住民的運動成就源自基因和生理的優異。

原住民有運動細胞的刻板印象，更透過媒體再現成型(吳宗衡

2 洪偉欽(2007)針對成年人(平地人、原住民)與頂尖選手共182人進行採血檢測，萃取DNA由生物科技公司進行自動化DNA定序，發現身體組成之相關基因多型性有族群差異。原住民組ADRB3基因(位於第八號染色體，與BMI有關)的Trp/Arg型在BMI顯著高於Trp/Trp型，顯示ADRB3基因與原住民身體質量指數相關。Klissouras(2001)也指出紅白肌肉纖維受基因影響甚鉅，最大肌力與基因的相關性約八至九成，印證了運動員是天生的。至今，針對「運動員是天生的」或「原住民與黑人是天生運動員」的論辯無數，仍欠缺足夠資料作定論(Kane 1971; Leonard 1998; Sailes 2000)。

2006)。多數球探表示：「原住民是臺灣棒球的藏寶庫。臺灣的好投手多半來自原住民，原住民球員的爆發力跟中南美洲的投手差不多」（《民生報》2004年12月5日）。過度強化本質論的說法會再製族群意識形態的偏見，更造成原住民深信其具備優秀運動基因的「自我實現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但此種本質說卻無法解釋原住民為何棒球成就顯赫，但在其他運動卻低度發展或缺席。我們須探究棒球運動特質與原住民生活文化的關連，才能提供完整的解釋（林文蘭 2011）。

2. 治理說與召喚國族意識的觀點

觀點二：打球讓原住民文明化？凝聚國族意識提升世界能見度？

日治初期，因深怕棒球會形塑臺灣人的自覺意識與團結，日本人嚴禁棒球比賽（蔡宗信 1991：76-96）。至二〇年代，高砂隊被日本人接收成立能高團，日本政府以棒球轉移原住民的仇日心理，消耗其反抗勢力，進行殖民文明化的任務（Yu 2007: 17-18）。從江口團長的口述與《日日新報》的資料，可見到教化觀點下潛藏的族群偏見：

我是為了矯正他們與生俱來的傳統兇暴血統，且也要對外廣泛地讓世人知道，對於蕃人教化已有實質成效，基於這些用意成立能高團的。我相信教導他們棒球，是增進他們教化程度最近的一條路。他們身體的運動能力非常地優秀，他們現在仍要加強的是比賽時運用思考腦力的習慣。加上他們存有蕃人的卑下及被支配心態，所以在數萬名觀眾包圍的球場上比賽的時候，會有膽怯的情形發生。（蔡宗信 1991：108-116）

日本政府透過棒球矯正原住民的兇暴，臺灣人打球成為宣傳殖民治理成效的工具（謝仕淵、謝佳芬 2003）。相反的，原住民則透過打

球象徵抗日，藉由成為運動英雄打出族群自信。³

阿美族孩子要想成為族人肯定的英雄，就必須接受嚴苛的測試，證實自己已具備在族人面前當領袖的各種能力。即使不是用族人所擅長的弓、箭，而是用棒球去向日本人挑戰，他們也展現了真正山地戰士的精神。（高正源 1994：50）

戰後棒球運動被邊緣化，亦呈現運動族群化的趨勢。⁴自1968年紅葉少棒擊敗來訪的日本隊，官方的國族意識形態主導臺灣的棒球史觀。面臨國際情勢不穩與統治正當性的危機，棒球成為凝聚民心 and 召喚國族意識的催化劑。透過英雄神話的社會操作與群眾簇擁的遊街儀式強化棒球明星的角色（梁淑玲 1993；林琪雯 1995；楊照 1992；Sundeen 2001）。

然而，過度看待國家機器的治理效率，勢必忽略當中存在反抗的可能。Klein（1991）在《糖球：美國的運動、多明尼加的美夢》分析多明尼加球員如何詮釋擊敗美國隊的意義。多明尼加球員意識到透過比賽能跟美國人抗衡，利用外來的大眾文化形式去抵抗霸權，更在象徵意義上抵抗因為文化宰制所衍生的經濟支配。⁵ Klein的研究啟發我們反思國族意識的建構或治理的觀點，無法充分反映原住民主觀詮釋棒球的意義，也未能釐清棒球在原住民社群發展的客觀條件。此外，原住民能否藉由打球展演出抵抗統治的文化形式，作為展現英雄主義的戰

3 日治的棒球運動被喻為抵抗策略的弱者技藝，展現出單純的球場存在著複雜的民族情結。藉由比賽的勝利，享受「臺灣人對抗日本人」，此種抵抗產生了愉悅和宣洩（張力可 2000）。

4 戰後外省人打籃球，本省人和原住民打棒球。

5 十九世紀中由於美國水手採買蔗糖並教導古巴人打球，棒球傳向加勒比海各國。多明尼加球員透過打敗美國隊，作為反抗他們被宰制的文化工具。多明尼加人透過棒球作為抵抗美國霸權的文化競奪場域，採取迂迴非力搏的文化抵抗和實作，藉由各種符號和文化的操作（如：大眾傳媒或穿戴的衣帽），以消極的論述或在日常生活中被述說（Klein 1991: 104-135）。

場和發揮男性氣概的文化工具，有賴深入理解原住民球員的運動特質和心靈習性。

3. 經濟誘因說

觀點三：原住民打球是為了賺錢？

既有研究指出運動成就可提升原住民的短期社經地位，針對原住民成棒選手的研究也發現其大多出身中下階級，打球的收穫是改善經濟(范春源 1999；林仁義 2001；林炎嘯 1998)。透過打球當國手進職棒享高薪，吸引社經貧困的原住民，把打球視為脫貧之球。⁶

對許多少數族群來說，運動成就是打造社會流動的媒介。少數族群在運動領域的過度代表性，是族群和社會結構互動的結果，更是族群文化和貧窮文化交互作用的產物(Semyonov 1984; Grey 1992)。由於運動提供逃離絕望、歧視和貧窮的避難所(Wacquant 1995)。身處社經劣勢的少數族群易追求高報酬的職業運動生涯，把運動視為向上流動的契機。⁷

檢視歷年來原民會培育原住民人才獎勵，體育類囊括獎勵金最多的範疇。然而，經濟誘因無法解釋棒球家族、棒球部落與跨地域的原住民棒球風氣。對於父親曾打球卻未能進入職棒，而把圓夢希望(而非脫貧契機)寄託在兒子打球也欠缺合理說法，更難解釋為何有部分高社經地位的原住民也打球。

-
- 6 以台東泰源部落的阿美族張姓兄弟為例：張進德[1993]國立體大成棒、張進龍[1994]臺灣體大成棒、張育成[1995]台中高農青棒、張育凡[1996]泰源少棒、張偉聖[1997]泰源青少棒。在2009年，五人均獲選國手。家境貧困令他們自幼就把部落中職棒明星的姓名寫在家門上，希望能像他們打球翻身改善經濟毋須挨餓。張家老大國中畢業前即獲日職球探青睞，但陷入合約紛爭，已於2011年6月進入美職匹茲堡海盜隊。
 - 7 針對多明尼加球員為何會奮發前進美職打球且擁有高成功率？有種解釋是他們不像美國人把棒球當作遊戲，而是看待成一份飯碗、一條翻身捷徑、一張脫離貧民窟的門票。

4. 社會流動說：學習失敗的替代物、升學階梯與翻身之球

觀點四：原住民不會或不喜歡唸書才打球？打球有助升學與翻身？

針對少數族群的學習不彰，由先前主導的文化剝奪論述，發展為文化差異的解釋，認為學校是疏離的機構。在早期同化政策下，原住民缺乏進入主流文化的能力，亦無法保存固有文化特質，淪入文化雙盲之困(瓦歷斯 1994)。既有研究發現原住民少棒球員擁有積極的打球動機，原住民遭遇學習不適與文化認同困難，加上運動是文化親近性高的學習活動，成為原住民在學業不彰的替代出路，打球變成升學階梯(林炎嘯 1998；林仁義 2001)。然而，學習失敗的替代物說法卻無法解釋為何學業成績佳的原住民也打球。

檢視不同身分學生之成績及格門檻，高中的運動績優生及格門檻在高一和高二均為40分，高三則是50分。採行積極差別待遇的成績考查雖立意良善，卻易造就特殊身分學生學習動機低落，擁抱學業無用和競技至上的價值觀。根據〈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明訂績優運動員甄審甄試的升學管道與成績條件。由於棒球是團隊競賽，以集體佳績達成升學的機會比個人單項運動要低。無法獲取團隊佳績，僅能藉個人技能甄選入學相關科系，或透過獨招被延攬入隊。投注長期訓練而無法維持學業也難以藉運動成績升學者，比例為何仍欠缺完整統計。循此，打球有助升學的勝算機率需被審慎評估。

自能高團球員羅道厚被招募進東京參議員隊(1936-1939年)，成為日職創始球員，棒球讓原住民得以升學、赴日，甚至在畢業後任職農會、電力或木材公司。而嘉農球員於戰後返回台東也大多進入教育界和公家機關。自九〇年代起，中華職棒的耀眼球星、逐夢大聯盟和挑戰日本職棒的個案紛現，原住民棒球英雄的偶像效應更刺激少棒球員的參與(范萬宇 2007)。媒體報導的職棒高薪和簽約金，部落親友與隊友學長的成功案例，投射出一條可及的翻身捷徑。然而，有幸晉升職棒殿堂者，身處高風險和不對等的職棒勞動體制(蔡侑霖 2003)，更得面臨職涯短暫和轉業困

難；無法進入職棒的多數，未具一技之長導致謀職受困(林文蘭 2007b)。

5. 失落的解釋

既有解釋忽略幾項關鍵因素：第一，源自歷史脈絡的路徑依存，提供原住民棒球知識傳承的教練人才，打球成為打造社會網絡和部落社交的工具(林文蘭 2008b)。第二，奠基於基層參與的堆疊效果，原住民(尤其阿美族)的棒球參與比例始終居高不下(見表一)。第三，原住民球員的訓練歷程及運動文化實作的樣貌罕被關注。紅土上的文化展演和運動儀式是原住民的文化再現舞台，更凝聚集體意識和催化運動能量(林文蘭 2011)。然而，他們在訓練歷程是否也展現特殊樣態？仍待探究。

(表一)原住民棒球參與比例分析表(青棒以上)

階段	人數(原住民/全體)		原住民比例
15支(曾進八強的)高中青棒隊	179 / 770		23.3%
16支大學甲組和成棒隊	193 / 634		30.4%
6支職棒球隊	76 / 183		41.5%
階段	阿美族	布農族	排灣族
高中青棒	116人 (64.8%)	20人 (11.2%)	19人 (10.6%)
甲組成棒	141人 (73.1%)	19人 (7.3%)	20人 (8.3%)
職棒	64人 (84%)	4人 (5.3%)	1人 (1.3%)

資料來源：整理自林伯修、朱自敏(2009：70-71)。

說明：原住民占全台人口2%。阿美族占原住民35%，布農族占10%，排灣族占17%。

面對著翻身成功是少數、機會有限、離退受困，為何原住民仍選擇去打球？從社會流動的視野觀之，可分為兩個層次：其一是打球可改變社會地位，亦即常見的向上社會流動的論述；其二是運動機會結構的升遷，亦即在運動場域中競逐出賽機會、升學機會和運動職位的空缺，這在既有研究中則少被論及。社會世界中的社會流動機會奠基在運動世界中的流動升遷，我們必須探究那打造運動升遷機會的訓練

體制。此外，打球被看待為社會流動的階梯，但成功者有限反倒促使社會流動的障礙越高(Chu 2007)。再加上運動機會結構的空缺有限，僅有少數能在競爭淘汰歷程中脫穎而出。究竟棒球能否讓原住民打出一條翻身之路，本文嘗試分析之。

(二)流動或複製：棒球作為翻身之梯或階層化之籬

教育究竟延續既有社會資源的分配不均，鞏固社會階層化，或是促進社會流動的等化器(equalizer)，成為翻身捷徑？此乃教育社會學的關鍵論辯。無論學校被視為政經架構下的一部分(Parsons 1954)，或是資本主義的產物和階級衝突的標的(Dahrendorf 1959)，甚至是階級再製的工具(Bowles and Gintis 1976)，均無法否認教育對個人未來的影響力。棒球運動附屬在學校教育才得以組訓，甚至成為球員主要的學習活動，檢視原住民球員的訓練體制，得以揭露教育黑箱究竟為原住民帶來什麼影響。

1. 棒球作為「社會分工」與「生存機會」的發展條件

教育提供社會分工的途徑，打破傳統社會的地位與職業分配，確保永久的價值和行為規條，以配合社會分工體系所需的行為自主性(Durkheim 1956)。Durkheim (1984[1893])指出社會秩序(social order)與社會凝聚(social solidarity)在傳統與當代社會的功能，其中「有機凝聚」(organic solidarity)的基礎在於社會分工的出現與深化，它建立在差異性與分殊性之上，促使人際間的依存性增強。Durkheim強調不能忽略社會分工背後的「社會性根源」，社會分工可維持社會的平衡，在教育上要發展不同的專業，使社會組成分子各盡其才。而社會分工即使不是社會凝聚的唯一源頭，至少也是主要因素。⁸

8 承繼此觀點，Parsons (1961) 也堅信社會分工體系仰賴教育。他指出學校擔負兩種功能：社會化(socialization)與篩選(selection)。學校是發展個人在他們未來角色扮演的

教育成就是影響個人生存機會(life chances)的最重要因素(Weber 1978)。Weber(1972)指出教育的目的有二：作為篩選的機制和過程、有助於形成社會藩籬(social closure)造成地位閉鎖以保護可欲的地位。此外，教育活動主要在教導特定的地位文化，汰選新的成員，甚至是「職業分派」(occupational placement)的機制或「文化汰選」的管道，為雇主篩選可欲的勞動力(Collins 1971)。

究竟在棒球教育過程中透過何種機制達成未來社會分工的目的？本研究關切原住民如何鑲嵌進特定的社會分工版圖，透過學校組訓過程逐步將原住民汰選到被分派的角色：職棒選手。藉由檢視高比例原住民職棒選手背後所生成的歷史脈絡和訓練條件，將能理解地位結晶化與社會藩籬的具體內涵，亦能彰顯教育如何作為社會分工的機制和影響未來生存機會的轉軸器。

2. 棒球作為社會流動和階層化的控制機制

教育是分派個人於社會階層的關鍵機制。功能論的解釋強調教育對社會穩定的重要性(Durkheim 1977)。教育能淡化學生與生俱有的家庭背景影響，使個人發揮才智，在社會中各得其所與形成分工體制。而各種職位具有不同的執行功能，彼此間的差異經過逐步制度化形成各種社會階層，社會結構從而穩固維繫(Davis and Moore 1945)。衝突論的觀點認為教育服侍上層階級，社會階層化是權力和利益分配的結果。社會弱勢者無法獲得公平的教育機會享有相近的教育品質，繼續在世代之間繁衍產生「階級再製」(Bowles and Gintis 1976)。

社會流動的主要功能有三：激勵個人志向和成就、對既存社會階層的重分配、維繫社會秩序與忠誠。教育被視為社會流動的關鍵，無論是作為「中介」或「傳遞」機制。所有的社會都具備篩選機制，控制著

起點，透過篩選過程破除個人承繼的角色，強化個人的成就動機。

社會流動的過程，包括：「檢測評核」(testing)、「篩選汰除」(selecting)與「分配發派」(distributing)三種形式。學校是個人進入勞動力市場之前的篩選評核機構(Sorokin 1959)。它並非是消除不平等的機構，而是強化社會差異和維繫社會階層化的機制。社會流動無論展現形式為何，均蘊含社會功能並具有安全閥之效。

而「競逐流動」(contest mobility)和「薦舉流動」(sponsored mobility)這兩種社會流動的原型，與再製不平等有很大的關連。無論是哪種流動模式，社會不平等的常態都須取得正當性才能維繫。維繫關鍵在於如何確保輸家和劣勢者忠誠於既存體制，安於接受資源較少和地位較低的現實。我認為在棒球運動中，這兩種流動形式均仰賴訓練體制來維繫，灌輸不同流動形式的規範和價值，以產生社會控制的效果。在競逐流動的體系，球員被教導盡力追求未來的成功，公平競爭的未來與延遲夢想的實現，促使球員在競爭過程中，強化對體制的認同和忠誠。而在薦舉流動的體系，選拔過程提早進行，區分出「值得培養」的獲選者與「不具競爭力」的落選者。提前訓練獲選者取得專業憑證，對落選者進行社會化，使其接受資質較差的自我認知和現實主義，據以維繫體制的運作(Turner 1960)。

球場不但是教導流動價值觀和規範的場域，更是流動競逐的決定性場域。表面上球隊以客觀的測驗篩選球員，運動成就由個人的努力來評定，失敗則歸咎於能力不足。球隊用客觀中立之貌掩飾其再製功能，解決了「如何使輸家對體制保持忠誠」。直言之，每個社會都需要合理化不平等存在的事實。身處底層者須被說服或相信他們適得其位。而取得正當性的方法則是：系統性的進行意識形態的合理化(Lenski 1966)，促使現狀變成自然的、邏輯上的與道德上的合理狀態。

準此，訓練體制在當中究竟如何扮演評核、篩選和分配的機制？在保持少數贏家的社會流動機率下，如何維繫多數輸家對體制的忠誠和認同？使其肯認意識形態的合理化並參與其中？究竟在少數流動的

包裝下，如何掩飾多數困境複製的現實，即是本文欲解開之謎。

此外，我認為在「教育選擇—就業謀職」之間的連結並非是靜態的因果關連，當原住民較傾向體育性的教育選擇，採取決定論式地以族群屬性或社經背景作為解釋變項，勢必忽略當中潛藏的教育結構的制度設計，如何導引他們主動選擇某些分化的教育路徑，繼而產生特定的謀職群聚效應。直言之，特定族群集體分流的教育軌道，不只影響各別行動者的教育選擇和謀職趨勢，更牽動族群集體的發展和社會分工的定型化。我認為特定族群在教育選擇和謀職機會的分布與差異必須能透過某種控制或汰選機制而以固定結構被持存(sustained)，亦即不平等是可以被再生產的，才可能形成與深化社會階層化，「訓練體制」即是解釋不平等如何維繫的關鍵。透過差別化的訓練安排，藉由訓練的政治性規範工具，對運動主體形塑了政治及意識形態效應，教導其合理化不平等和階序差異的意識形態。

(三)運動機會結構：流動與競爭

1. 少數族群的運動參與和流動

少數族群在特定運動的高度參與是運動社會學廣被研究的議題。例如：美國黑人運動員在特定運動表現突出，當中存有種族歧視的殘餘色彩(Eitzen 1989; Eitzen and Sage 1993)。此種對運動的偏好是黑人次文化的特徵，經濟劣勢並非是決定其運動參與的唯一原因，社會結構因素更是關鍵(Spreitzer and Snyder 1990; Philips 1993; Eitzen and Sage 1993)。

針對少數族群運動參與比例特別顯著的解釋，在先生物條件與後天社會環境之間論戰不斷(Kane 1971; Leonard 1998; Sailes 2000; Hartmann 2000)。近年來，文化、社會結構與網絡的因素已被多數研究所支持(Phillips 1993: ch.7-8; Eitzen and Sage 1993: 330-332; Nixon 1993)。少數族群的運動選擇偏好或動機，乃是其與外在環境、歷史軌跡和文化脈

絡產生接合的結果(林文蘭 2010)。

運動更是種族議題的競逐場域，運動場域中的「堆疊」(stacking)導致運動地位的族群區隔(Leonard 1998; Philips 1993)。堆疊是指少數族群運動員集中在特定位置，必須和同族群者競爭機會，當中呈現運動社會化與模仿的族群差異，堆疊乃是經由運動員自我選擇的過程而被複製(Stebbins 1993)。

長久以來，運動被視為社會流動管道的原型。⁹但運動能否成為未來成就的墊腳石，運動職涯是否為開放的社會流動路徑，既有研究持著正反的看法：

正面觀點認為運動提供正向機制可促進向上流動，它是一股社會底層者的誘惑力量，無論是賺取高薪或翻身契機，運動更可挑戰既有的社會分工秩序和不平等(Nabil 1980; Braddock 1980; Carrington 1986; Horne et al. 1999: 95-128)。對出身低社經地位者來說，運動被認為向上流動的有效管道，少數族群易被高報酬的職業運動生涯所吸引，出現熱衷趨勢(Edwards 1973; Semyonov and Yuchtman-Yaar 1981; Grey 1992)。¹⁰因此，社經地位和族群身分的雙重弱勢，共同促進少數族群參與運動的成就動機。

反面立場指出運動是社會流動的絆腳石。運動明星的媒體再現創造出榮景和幻覺，使其成為文化偶像或窮人典範。運動被看待為遠離

9 運動參與和社會階層化之間關連的主要討論脈絡有：一、作為炫耀性消費的手段(Veblen 1953)。二、作為社會區辨的工具(Bourdieu 1984)。三、從衝突論觀點檢視運動作為意識形態的武器，如何展現階級衝突，下層階級何以崇尚某些運動項目中的暴力和反社會傾向(Hargreaves 1992; Holt 1989)。四、從社會流動的立場，探究運動如何成為社會底層者的流動管道。五、運動如何扮演社會不平等的製造者，包含進入門檻的機會差異和參與運動的效果(Tatz 1995; Sailes 1996; Hoberman 1997; 徐茜 2008)。其中以流動說最蓬勃發展。

10 關於運動是社會流動電扶梯的信念主要被建立在一系列的迷思之上，包括：運動可提供免費的大學教育；運動可獲得大學文憑；專業職涯有實現可能性；運動是遠離貧窮的康莊大道；專業職涯能提供生活保障。這些迷思均被經驗證據予以駁斥(Eitzen 2006: 175-176)。

貧民窟的門票，成為社經弱勢者的優先選項，促使年輕人貶抑學業價值(Hoberman 1997; Hartmann 2000; Cashmore 2005)。此外，成為專業運動員的機會結構有限且職涯短暫，若未能及早規劃離退出路，易遭遇向下流動的處境(Houlston 1982; Leonard and Reyman 1988)。

更重要的是，運動成為社會流動電扶梯的可能性有限，它至少具備兩種負面結果：首先，出身貧困者致力成為運動明星，除極少數能成功，多數人在運動世界和真實世界易遭遇失敗，因為運動技能和謀職要求毫無關連。其次，運動促成一種意識形態的發展，由於運動在本質上是功績主義的(meritocratic)，其強化成功必定來自勤奮不懈的迷思：無論出身為何，人人均有機會在運動世界中攀升，沒有成功是因為不夠努力所致(Eitzen 2006: 182-184)。

針對少數族群廣泛投入運動的後果，首先由運動明星 Arthur Ashe 和 Walt Frazier 與社會學家 Harry Edwards 呼籲反省(Riess 1980: 295)。在一個種族主義和不公正的社會中，運動的確是少數可及的社會流動機會。相較於強勢族群和高社經背景者，弱勢者更傾向投入運動領域。由於成為運動明星並非遙不可及的想法充滿心靈，遂與成功與否的勝算機率來對賭。既有研究指出在這場賭局中出現太多落敗者在未具技能下落入更糟的處境(Sailes 1996)。¹¹

當運動員退役後欲謀求第二職涯，不平等法則仍持續運作。專業運動要求的技能，難以被運用在其他職業，運動經歷遂成為社會流動的絆腳石(Semyonov 1986)。本文認為聚焦在原住民何以想追求職棒工作，探究當中的訓練體制和運動機會結構的晉升過程，有助於釐清運動造成的社會流動機制和效果。

11 運動雖提供社會流動的機會，但成功機會猶如百萬夢想中的一個明星(Cashmore 2005: 205)。部分研究更在文末對少數族裔呼籲：運動不過是場短暫的競賽遊戲，教育才能終身受用，沒有人應該為了追求此夢想，忽略生活中的其他努力(Sailes 1996)。非裔美籍運動社會學者 Harry Edwards 更諷喻之：「統計上來說，在下個十年中，相較於獲得專業運動員的工作，你還比較有機會被隕石擊中」(Eitzen 2006: 179)。

2. 訓練體制下的競爭升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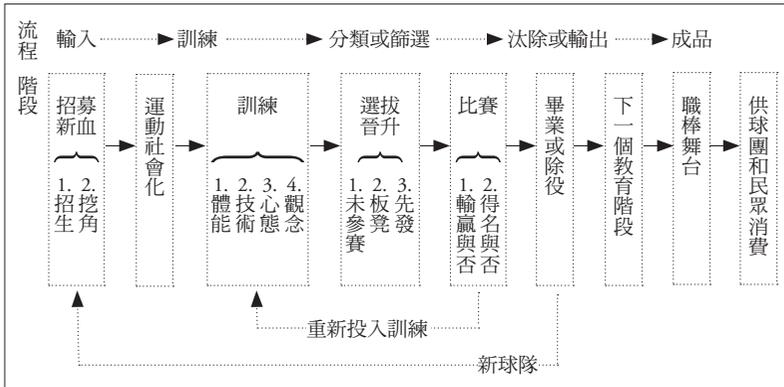
Gary Alan Fine (1985, 1987) 指出團隊運動會建構出運動社群和成員的共同文化。他歷經三個賽季參與觀察五個少棒聯盟和十支球隊，發現少棒聯盟是具備「任務—取向日標」(贏比賽、學技術)和「社會情感目標」(有樂趣、交朋友)的文化創生團體(culture-producing group)。Fine 指出少棒聯盟的運動本質是留下回憶而非競賽，目的是推廣運動風氣。¹² 反觀臺灣，透過校際間的競賽爭取優勝或代表權，採行以賽代訓的錦標主義，甚至組訓明星聯隊參與國際賽事，有別於美國的組訓動機和運動本質，從中更建構出特殊的訓練體制。

針對臺灣職棒選手勞動過程的研究，描繪出職業球員的練習週期和規訓機制，指出競技運動是一套知識與權力的規訓機制(蔡侑霖 2003: 50-64)。然而，從少棒晉升到職棒球員之路絕非一蹴可幾，職棒球員所內化的規訓心態源自其所經歷的運動社會化。學齡球員所體驗的訓練體制，是打造其面對未來職棒勞動體制的運動慣習之關鍵平台，無論是體能、階序感或競爭求存的心態。藉由梳理原住民球員在青春期的運動社會化過程，得以釐清在艱辛訓練中，如何令其銜接職棒勞動體制的運動身體、習性和意識。

在機會有限的運動結構中，競爭升遷流動的機會是球員力求的目標。本文援用 Burawoy (1979, 1985) 在工廠勞動研究的成果，提出訓練體制是規範訓練過程的制度，包括：訓練的政治性規範工具、訓練過程所形塑的政治及意識形態效應。不同階段的紅土球場均致力訓練球員的體能和球技，球員透過生產隱形產品和競賽成績，以便有機會追求職棒生涯。

12 即便少棒聯盟曾被批評為「擬似軍隊組織」(quasi-militaristic organization)。但支持少棒聯盟者聲稱其可：減少犯罪或偏差行為、增進容忍力、教導技術、裨益球員的自尊心、對球員產生社會效益、提升領導特質。抨擊者認為少棒聯盟會：導致運動傷害、過於競爭、教練專業不足、旁觀的家長破壞比賽、剝削球員(即貪婪的成人透過商業利益掠奪單純的運動本質)、減損球員的自發性(Fine 1987: 196-217)。

打造職棒球員的生產歷程有其競爭、流動與循環的各種環節，依序是：招募新球員培訓，藉由訓練過程中的各種篩選機制，汰除不適合者，讓合適者進入下一個教育階段，最後在層層訓練、比賽和運動升遷後，造就出踏上職棒舞台的球員，供球團、民眾及產業預備軍消費(見圖一)。



(圖一)打造職棒球員的歷程

棒球訓練追求技術的熟練，讓球員具備「精確度」(對時空的掌握，即球感)與「協調性」(合理地使體能發揮到最大的狀態)，並能在肌力、爆發力和速度有所維持與突破(蔡侑霖 2003：52)。然而，在訓練過程中運動主體充滿易變性和可塑性，更會面臨例行化訓練或訓練控制的難度，再加上高壓式的訓練管理未必徹底奏效，可能會面臨球員的倦勤與反抗。因此，如能對球員建立意識形態的規範機制，有效管控教練與球員之間的訓練關係，便有機會克服訓練產出過程中存在的不確定性。透過訓練規劃和能力編組、設置獎懲與運動升遷機會的安排，可掌握訓練控制的關鍵，從中形塑球員的訓練意識。

然而，原住民球員為何樂於擁抱艱辛的訓練？其所經歷的運動社會化展現在三個層面：一、訓練文化：身處既合作又競爭的雙重狀態，

原住民球員透過競賽遊戲、喊聲、戰舞和戰歌，緩衝蘊藏的衝突對立，抒解冗長艱辛的訓練疲乏感。二、內部競爭機制：球員競爭運動機會結構的空缺位置和升遷流動，個人競爭取代團體合作，得以極大化團隊的訓練效益。三、內部管理制度：藉由管理制度有效降低衝突、解決資源分配和出賽機會的爭議。如：遴選出賽機制、學長管教機制。

棒球的訓練特質是身體的高耗能性、訓練產品的隱形性、傷害的高風險性、報酬的不確定性。棒球訓練內容不出打、跑、接、投(傳)四項，一方面必須針對身體能力和訓練過程加以管理，透過手腦分離化遂行訓練控制目的(Rigauer 1981; Beamish 1982)；另一方面訓練本身更是身體規訓、精熟與鬥爭的所在(Foucault 1977; Bourdieu 1988)，使球員習得競賽的技藝。從而在艱辛訓練過程中融入娛樂化元素，透過客觀的訓練與篩選機制，打造與重塑球員面對升遷競爭的主觀感受，甚至緩解有朝一日被淘汰的處境。

由於球員的身體及其生產的隱形產品是訓練控制的焦點，必須同時再生產有生產力的身體，以維持體能和健康，更要創造其自我規訓的監管意識，降低訓練管理成本，以確保服從和執行訓練。本文希望勾繪原住民球員所遭逢的訓練體制，如何使其樂於擁抱高耗能、隱形報酬、不確定產出的訓練過程。採取訓練體制的分析觀點，可含納行動者的角色，檢視當中的控制和規訓的獨特性如何確保訓練產出，探究行動者如何經驗和回應訓練歷程，對行動者又造成什麼效果。

三、研究方法

進行田野工作之前，彙整下列資料建立基本圖像：一、蒐集相關的報章雜誌和研究論文，整理聯合知識庫、中時新聞庫的體育版新聞與臺灣棒球運動珍貴新聞檔案數位資料庫。二、分析學生棒球聯盟的歷屆參賽紀錄，掌握學生棒球運動的發展趨勢。

本文採取田野工作和文本分析作為論證基礎。¹³民族誌對教育研究的貢獻是：揭露關於不同文化和少數族群的誤解，優點是多樣性、真實性和複雜性，能詮釋性的理解不同研究主體的社會行動意義，確認脈絡化的影響，挖掘研究主體的觀點。透過民族誌蒐集的微觀資料，可增補關於體制如何形構的宏觀分析，檢視體制實踐所產生的衝擊。如此可釐清體制所蘊含的規範工具和意識形態效應，亦能關照行動者的主體能動性，提供較完整的分析圖像。

台東是全台人口密度最低的縣市，少棒組訓密度卻居全台最高。本研究以台東作為主要觀察田野，透過九個月的民族誌，聚焦在一所針對原住民運動員所設立的體育中學棒球隊，¹⁴參與球員的訓練情境和南征北討的賽事，並觀察其他原住民基層球隊的訓練實作。貼近原住民球員的運動世界，可體察其置身的時空脈絡，梳理其所座落的運動軌跡、訓練遊戲與文化，如何打造其苦中作樂的支撐，剖析原住民運動參與的特殊性。

進入田野的行政作業於2007年8月徵詢校方同意後，田野工作歷時九個月（2007年10月到2008年6月）：

一、擔任隨隊志工，參與觀察球員的升學考試和招生實況，針對例行培訓、隊務管理、移地訓練、異地盃賽、校園生活和部落壘球活動蒐集資料，佐以球員的訓練日記進行生活實體建構。

13 文本分析主要蒐集球員的訓練日記（共95位，每週記錄1次，短則1年，長則4年，合計有1,633頁），探究球員的身體感知與運動實踐。引用說明：A-1[17]代表A梯球員的第1頁，寫作該篇的年齡是17歲。本文主張原文徵引，不更改錯別字，維持報導人使用的語彙。錯別處以底線標示之。

14 台東體中是全台第一所培育專業運動員的中學，設有九種運動專長項目，原住民比例逾七成。棒球隊（青少棒和青棒）球員共九十人，原住民比例近九成。其中阿美族占54.4%，布農族13.3%，排灣族10%，卑南族5.6%，太魯閣族2.2%，泰雅族1.1%，魯凱族1.1%，閩南籍10%，客籍2.2%。教練均為原住民籍。成軍十六年已栽培逾二十位中職選手，更有進軍美日職棒和參與威廉波特少棒賽的球員，以及出身棒球家族、部落和名校的球員。

二、兼顧不同的族群別和部落別，進行焦點式訪談，包括：球員、老師、教練、親友和校友共76位報導人(見表二)。針對來自不同學校、部落的球員或出國比賽經驗進行焦點團體訪談，並追蹤再訪畢業球員的生命史。非正式訪談對象(校友、師長、教練、親友、他隊球員、裁判、球迷、球員保母、球探)近百位。進一步將田野筆記與訪談逐字稿作轉譯、比較和詮釋分析，了解來自不同部落和球隊的運動週期與訓練模式。

(表二)報導人基本資料表

n=76

分類	人數	%	分類	人數	%
性別			縣市別		
男	67	88.2	台東	63	82.9
女	9	11.8	花蓮	4	5.3
身分			其他	9	11.8
高中球員	26	34.2	族群別		
國中球員	21	27.6	阿美	44	57.9
校友	8	10.5	布農	8	10.5
教練	3	3.9	卑南	6	7.9
家長	4	5.3	排灣	5	6.6
老師	6	7.9	泰雅	2	2.6
關鍵人士	8	10.5	太魯閣	2	2.6
球齡(平均6.6年)			魯凱	1	1.3
高中球員7.6年			閩南	8	10.5
國中球員5.5年			國手	17	36.2

說明1：關鍵人士：後援會人士、部落壘球隊隊長、棒球部落中不鼓勵小孩打球的家長。

說明2：分布部落：台東的豐年部落14位，南王部落7位，三民部落5位，泰源部落4位，豐榮、都歷、鸞山及武陵部落各3位，重安、太平、馬蘭部落及屏東牡丹部落各2位，其他部落各1位。

本文分析資料來自兩階段的資料收集。第一階段自2007年12月初訪首位報導人，截至2008年7月離開田野，共面訪55位報導人。在訓練實況外，參與觀察球員的移地訓練(在台東、高雄、嘉義、台北與台

南等地)及各種賽事(縣聯賽、全國賽、錦標賽、邀請賽和選拔賽)，並參與升學考試活動。

第二階段從離開田野到2010年12月，除重訪部分球員，參與觀察關鍵賽事，也增補21位報導人。由於球員的訓練時間緊湊，為確認資料的信度和效度，在空檔中訪談、續訪或追蹤電訪有其必要，其中有位關鍵報導人再訪達10次，另一位則有7次，其餘至多為3次。

訪談的代碼H為高中球員、J為國中球員、C為教練、T為教師、P為球員家長、A為校友、I為關鍵人士。例如「H01:2」表示訪談序位第1位高中球員逐字稿的第2頁，「J1007:4-5」代表訪談序位第10位國中球員的第7次訪談逐字稿的第4-5頁。邀請受訪者自訂化名，未提供者才給予別名。

由於球隊的參賽組訓權是以學校而非部落為單位，從教育民族誌的立場出發，對焦在訓練體制可釐清球員的升學路徑和運動機會背後所蘊藏的個體能動和結構條件，理解原住民球員所置身的訓練體制的特質，揭露出形構球員意識形態的要素。針對「原住民如何成為職棒選手」的謎題，現身於媒體的原住民職棒球員證成社會流動的虛象，再現原住民擅長打球的形象。在這條打造原住民職棒球員的生產流程裡，成功案例廣獲報導，即便最終囿於職棒勞動體制。本文試圖勾繪原住民球員遭逢的流動結構，檢視其所座落的訓練體制，透過分析運動軌跡、競賽遊戲與文化、訓練過程的不確定性、意識形態的監管機制，解答原住民如何成為棒球選手的訓練過程。

四、原住民的棒球路

「族群」(ethnic groups)是一套關於人群分類的意識形態，其並非因為有本質性的特質才存在，而是被人們的「族群想像」(ethnic imagination)所界定並發揮社會凝聚的力量(王甫昌 2003)。在臺灣社會中，棒球作為

對原住民的族群想像元素，在原／漢之間形構出關於運動能力的意識形態、原住民投身棒球運動的本質說和經濟誘因的族群想像，更造就原住民內部的棒球認同。原住民成為臺灣棒球發展的關鍵角色，源自長遠的歷史脈絡。

(一)原住民棒球發展概述¹⁵

1. 日治時期

日治初期殖民政府實施差別待遇，加上「野球有害論」的爭議，憂慮棒球會集結臺灣人的團結意識，因此臺灣人接觸棒球機會渺茫。目前史料均指出原住民棒球的崛起源自能高團。1921年林桂興於秀姑巒溪畔見到一群阿美族少年用木棒和石頭投擲丟打，便號召成立「高砂棒球隊」。1923年承辦花蓮港工程的日籍社長與花蓮港廳廳長，促成高砂球員就讀花蓮港農業補習學校(今花蓮高農)，且被更名為能高團(蔡宗信 1991；高正源 1994)。¹⁶

1925年能高團到東京進行一個月友誼賽，戰績優異吸引球探挖角，球員被安排赴日就讀或投入其他球隊與職場，出眾的表現促發球員各奔前程的解散危機。自1926年起，東區少棒大會的冠軍幾乎為原住民學校囊括，由臺灣人就讀的公學校參加地區預賽高達十四隊，居全台之冠，東部棒球熱潮自此蔓延，更促使嘉農的教練前往選拔球員。1931年嘉農代表赴日參賽更一舉奪得甲子園亞軍(蔡宗信 1991；高正源 1994；林華韋、林玫君 2005)。¹⁷

15 歷史發展圖像請參閱林文蘭(2007a附錄，2007b，2008a，2008b)。

16 能高(NOKO)以南投和花蓮交界之能高山命名，與玉山和奇萊山並列日治三大高山。當年有人憂心能高有僭越之意，宜改稱阿美族野球團(蔡宗信 1991：112)。

17 這支號稱三族共治的嘉農球隊以原住民為主體，如：陳耕元(卑南族)、拓弘山(阿美族)、藍德和(阿美族)、羅保農(阿美族)。嘉農更培養許多阿美族球員，三度囊括臺灣區冠軍，包括：楊吉川、郭壯馬、柳盛遠、藍德明、南信彥、林清嵐、郭光也。

二〇年代中期東部棒球運動已在學校風行。三〇年代台東海岸線的少棒更蓬勃發展，幾近每所小學均組訓球隊。除南王國小是以卑南族為主的學校，其餘均為阿美族聚居的學校。而棒球風氣鼎盛的部落，花蓮以太巴壠和馬太鞍部落為主，台東則是馬蘭和鄰近成功的部落(林文蘭 2008b；高克武 2011)。

2. 國民政府時期

戰後初期因棒球被視為日本人的球而被國民政府廢除校際比賽，更未被列入全台競賽，各級學校對棒球漸趨冷淡(梁淑玲 1993；陳嘉謀 2002)。但台東卻是另類樣貌，二二八事件後，任職嘉農教練的陳耕元返鄉擔任東農校長籌組球隊，培育楊傳廣和豐自吉兩位揚名國際的選手(高正源 1995a)。¹⁸郭光也隨後返回台東，與其子投入基層培訓。陳、郭兩人奠定東部原住民學校組訓的關鍵。

1963年紅葉國小校長發現學生就學意願低，但部落打耳祭的球賽卻能吸引未到校學童，遂籌組球隊激發學生到校。1968年紅葉少棒在全台勁旅中脫穎而出，暑假更兩度擊敗日本隊，創下少棒首次贏外國球隊的紀錄(王惠民 1994)。然而，啟用超齡球員和冒名頂替使紅葉球隊解組。1971年榮工處處長及棒協理事長嚴孝章，更在花蓮籌組榮工三級棒球體系，原住民棒球運動的培育首次出現完整規劃。榮工少棒在八〇年代前後盛極一時，獲得全國少棒選拔賽冠軍，更囊括威廉波特世界少棒賽冠軍(林文蘭 2007b)。¹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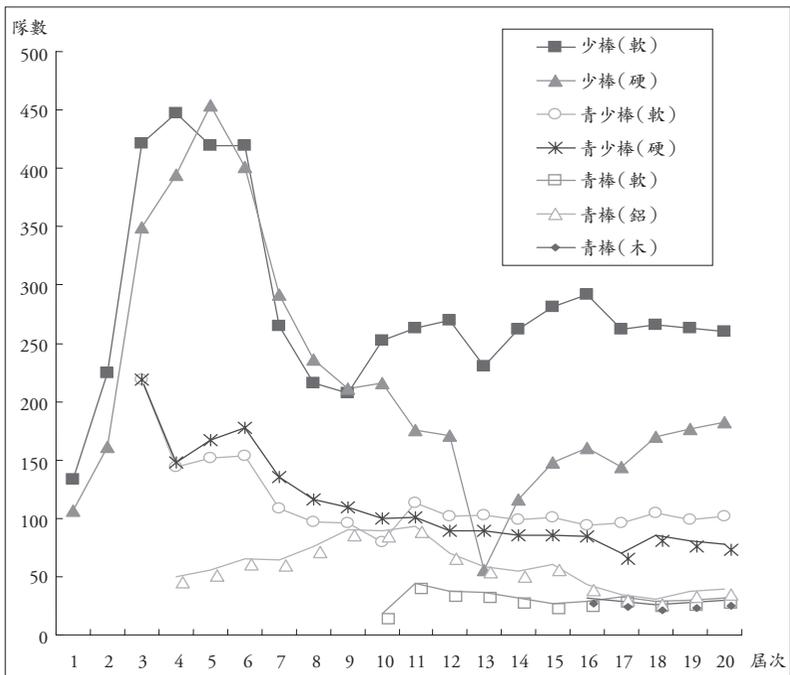
花東原住民學校的運動代表隊以球類為主，棒球隊近兩成(范春源 1999)。²⁰彙整二十年來學生棒球聯賽紀錄可發現：一、組訓率顯著下

18 陳耕元之子為陳建年，曾任台東縣長與原民會主委，興建棒球村更推動原住民體育事務。

19 榮工培育的球員有：陳義信、陳金茂、羅世幸、吳俊達、孫昭立、藍文成、黃平洋、王光熙……。

20 吳煜敏(2006)指出花蓮少棒代表隊占一成三，台東占三成。

滑 50%，少棒自巔峰期的四百五十隊剩兩百隊，青少棒則從兩百二十隊僅餘一百隊，青棒歷經鋁棒木棒的分組，現約三十隊(見圖二)。二、東部組訓率獨占鰲頭，台東組訓風氣超越花蓮。三、職棒開打年(1990年)為東部棒球鼎盛期，維持五年巔峰後驟降，少棒隊從七十支剩二十隊。四、球員外流至西部比例極高，都市原住民聚居的桃園是近年來組訓率最高的縣市(林文蘭 2007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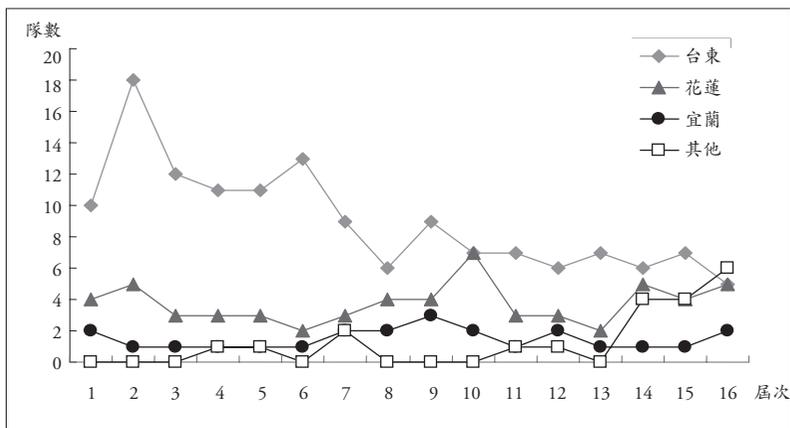
(圖二) 78-97學年度全台三級學生棒球聯賽參賽隊數統計圖

說明：少棒首屆為78學年度，青少棒首屆為80學年度，青棒首屆為81學年度。自93學年度起，青棒硬式組分為木棒和鋁棒兩組。

自1990年臺灣職棒成立，原住民職棒球員比例更逐年倍增。自職棒元年占25%，到2007年達41%，2007年以中信鯨原住民比例占五成五最高，誠泰 COBRAS 則有五成。此外，2006年十大高薪球員原住民

有四位，2007年和2008年原住民均有七位，月薪從23萬到83萬《聯合報》2007年3月19日；《聯合報》2008年12月21日。然而，耀眼薪資背後球員所置身的職棒勞動體制和生涯困境卻常被忽視(林文蘭 2007b)。

紅葉少棒紀念館於1992年啟用時，當年的職棒選手鄭幸生和陽介仁，以末代紅葉身分號召出身花東的職棒球員於1993年組成太平洋職棒聯誼會(已改名原住民棒球運動發展協會)，為花東球隊規劃關懷盃少棒賽。²¹自1994年開辦後逐漸轉為三級棒球，從首屆的16隊歷經十六屆已達36隊，台東參與比例最高(見圖三)。原住民棒球協會更舉辦棒球教室推廣技術，邀請原住民職棒選手親臨指導，激發原住民小球員打進職棒殿堂的夢想(林文蘭 2007b)。



(圖三)關懷盃少棒組歷年參賽統計圖

資料來源：作者參照「聯合知識庫」、「台灣棒球運動珍貴新聞檔案數位資料庫」製圖。



21 參賽資格：東部學校得組隊參加，東部以外學校需為原棒協會會員帶領之球隊，球隊需有70%以上球員為原住民。2008年的競賽規程改為原住民籍球員需占三分之二以上。

(二)運動機會結構的稀少性

1. 空缺有限、競爭無限

運動場域中的平等主義隱含功績主義的預設，雖有客觀指標可衡量運動成就，但功績主義忽視運動參與者付出的機會成本和能否獲得預期成就(邱韋誠 2003；謝柏宇 2011)。即便原住民職棒球員的比例可觀，但原住民在球場上的成就，僅是運動機會結構下的有限成就。在基層球員之外，教練、管理或經營決策階層罕見原住民，在運動權力的分配結構下，原住民仍處於被支配的位置(張力可 2000；邱韋誠 2006)。

運動機會結構的空缺鏈運作特質是：一、位置有限、競爭無窮。二、名次有限、比賽無窮。三、機會有限、希望無窮。為了打造運動金字塔頂端的球員，需透過運動社會化的歷程，讓不同運動實力的參與者，願意信仰且實踐公平競爭的運動意識形態。藉由訓練體制的施行，讓球員的無形潛力得以發揮為球技實作和運動能力。即便流動的空缺機會有限，卻可從中形塑球員彼此競爭求存的運動心態，打造出訓練效益的極大化。

整體而論，學齡球員同時面對三種運動結構的流動：一、運動位置的升遷機會，打造出運動空缺鏈的機會結構(見表三)。二、運動能力的變化，透過自我感知與他人評價，在體能和球技建立起參照對比的強弱認知、能否出賽或先發上場的階序意識。三、教育階段(或球隊)的改變，從單純的校際競賽晉升到專業職場的流動歷程，形塑出原住民的打球圓夢階梯(見圖四)。



(表三)臺灣棒球運動各級賽事球員人數分析表

賽事	隊數	球員數	出賽數
中華職棒	6	150人	【正式名單25人】 兄弟象、統一7-ELEVEn獅、興農牛、LaNew熊、中信鯨、米迪亞暴龍
二軍	5	一般84人 借將90人	代訓藍、LaNew二軍、統一二軍、中信二軍、兄弟二軍
成棒	15	375人	【球員名額30名，比賽登錄25名】 1.大專院校：國體(台啤)、台體(富邦公牛)、文化(美孚巨人)、開南(維輪實業)、輔大(泰安產險)、環球(志豪鍋爐)、北體、吳鳳、嘉藥、嘉大、大漢、立德、萬能 2.業餘成棒：合庫、台電
青棒(木)	28	504人	【各12-18名】青棒1,655人(odds=9%)
青棒(鋁)	37	648人	
青棒(軟)	30	503人	
青少棒(硬)	81	1,218人	【各12-16名】青少棒2,716人(odds=5.5%)
青少棒(軟)	99	1,498人	
少棒(硬)	177	2,427人	【各12-16名】少棒6,156人(odds=2.4%)
少棒(軟)	263	3,729人	

資料來源：參照學生棒聯之「96學年度三級學生棒球聯賽競賽規程及賽程表」、中華棒協之「97年全國成棒甲組春季聯賽」、中職聯盟資料製表而成。

說明1：統計時間為96學年度(2007年8月至2008年7月)。此份統計為正式參賽名單，不是球隊所有人數，正確的odds值應更低。odds推估不包括進軍美日職棒球員。如回溯推估培訓期(10-14年前)的組訓隊數與球員數則odds值更低，估計不到現今值的1/2。

說明2：截至2009年12月中職剩4隊：兄弟象、統一7-ELEVEn獅、興農牛、LaNew熊。二軍也剩4隊。成棒有21隊，大專院校增加：高苑科大、北臺灣學院，吳鳳更名為民雄打貓。業餘成棒增加：台北市成棒、台北縣成棒、桃園航空城、台中威達超舜。

教練透過出賽空缺稀少性，從中建構出從有限的位置到無盡的競爭的治理策略。雖然先發名單有限，參賽球員須競爭僅有的九個出場位置。但比賽機會無窮，永遠都有比賽、出賽名單和一二軍的競爭。透過在訓練過程中一二軍的分組和分隊操作，只要球員進步、表現好，永遠都有晉升機會。一旦退步、表現差隨即被取代。適度的操作流動升降，可激發球員奮發練習的動機，更是安排訓練模式的利器。

例如，每天辛勤苦練都是競爭求存的實踐，球員深諳：「苦練再苦

練，球衣只有16 / 18件」(D-36[13])。不苦練會淪為抬球的球保或撿球的球僮：「外野的守備位置太淺了，那一天的我很像在外野騎摩托車。希望練習時別在玩了，如果不認真練習，我看高一抬球的會是我」(D-41[14])。此外，就算有機會穿上比賽球衣也未必能出場，成為先發的動力使球員力求進步。在競爭求存的生態中，只要不加強、沒進步，背後總有取而代之的替補者。

2. 競爭升遷機會

在訓練過程中，教練透過運動位置升降的流動策略，建立球員彼此的競爭階序位置是提升訓練效率的催化劑。如：採取AB隊或一二軍的分組訓練，讓球員知道所處的運動位置、升降空間和流動時機，激發球員對球技的強弱認知和出賽機率，更免責了教練差別待遇的不公疑慮，達成依據能力組訓和運動治理的雙重目的。

在依據球技分組培訓的過程中，面對著一二軍的差別化課表和運動實作，球員起先會保有高昂的變強鬥志，因心有不甘得從事勞役、到室內練球或讓出球場，反倒成為力搏向上的動力。倘若遭遇運動傷害，或即便苦練仍無升遷機會，甚至不被看好或被冷淡忽略，自我放逐意識便悄然萌生。

可能命不好吧！被放下二軍，說明了二軍就是球隊中最弱的一些人，我很傷心，但可憐的是練習，被放在一旁，好像不是球隊的一份子，在球場上只不過是小球保。打球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現在卻是苦的要命，很像在虐待自我。(B-46[16])

由於流動的空缺機會有限，運動治理的機制是透過不定時升降、不確知出賽、不一定先發，讓球員在訓練過程中，永遠都有機會出賽、晉升、上場。紅土上的運動升遷和流動時機主要有四個階段：

(1)預備期：篩選分組的階段令球員繃緊神經和練習情緒，希望贏得領先群的先機。

(2)晉升期：調整球員的升遷機會，讓二軍或B隊有進步的期許，並造成一軍或A隊怕退步的心理。透過定時測驗與操弄一二軍和AB隊之間的競爭情節和限量名額，使球員致力練習，因為沒有人願意「**回去B隊吃灰塵練習**」(E-118[13])。

(3)篩選期：創造升降的空缺機會，藉由逐步分層汰選，維持球員的競爭感和苦練求存的心態。例如：在擬定出賽名單前，預留調整名額給球員力拼最後的參賽機會。身為AB隊或一二軍編組，是訓練的隱形產品中球員能感知到的表現，參賽名單則是外顯的具體成果。隨後則是拼上一軍求參賽，穿上球衣拼先發，永遠都有競逐目標。

(4)作戰期：一旦被登錄競賽名單，球員念茲在茲的就是搶先發。透過營造「人人有機會個個沒把握」的出場氣氛，在開賽前才告知先發的攻守名單，可讓每位球員都做好上場準備激發臨場拼勁。

訓練體制的治理關鍵是維持參與者甘於持續下注、跟進、同玩競逐升遷的機制，讓玩得好的球員戒慎恐懼怕被超越；玩不好的球員不時自許迎頭趕上。當球員自我安慰無法參賽，自我說服為何坐板凳，便造就無止盡的競逐升遷持續運作，更讓球員逐漸內化競爭求存和適者生存的運動意識形態。

(三)當原住民成為職棒球員：風光與風險

職棒是棒球運動發展成熟的果實，亦是球員勤奮訓練之所繫。但臺灣職棒市場的空缺有限，所有球團的現役和儲備球員缺額，無法容納所有自大學或高中(職)球隊畢業的選手。臺灣的棒球運動結構屬於低需求低供應的小規模產業，自青棒階段起，球員在運動機會結構的流動僅限於少數明星球員，堪稱是早熟型提前進入職涯的菁英流動結

構(郭振生 2009)。²²以棒球運動的金字塔結構觀之,當跨越上下不同層級的球員數量差距越大時,即面臨更激烈的淘汰賽局。

晉升職棒的球員其棒球路絕非順遂無波,其中潛藏無數的風險。首先,勞動過程由球季和賽程所構成,搭配著春訓與秋訓的調整週期,維持球員高度可運作的體能狀態。健康的身體是球員和球團的資產,球員更需配合球團公關宣傳行程。其次,面臨有限的薪資協商空間、向資方傾斜的契約、被買斷的勞動商品、缺乏完善的工作條件(蔡侑霖 2003:29-100),更體現出職棒勞動體制的隱形剝削和不對等。第三,臺灣職棒屬於生產者獨占的市場,由單一買方(中職聯盟)面對許多賣方(球員)。在封閉獨占的市場結構下,缺乏自由球員制度或抗衡的職棒聯盟,造成獨占式剝削的狀態(朱文增 2003)。

欠缺與資方協商的對等空間,職棒球員僅能被動接受保障不足的合約,易遭遇不適任被解約、釋出或解散球隊的風險。加上職棒版圖不大,現行契約限制球員的跳槽流動,軍事化管理促使球員成為被俘虜的勞動力(林華章 2002;蔡侑霖 2003:83-100)。據統計,臺灣職棒球員平均薪資逐年下滑。在買方獨占的市場形態下,球員的議價空間不高。近十年反倒出現球團收益逐年增加,球員薪資逐年下降的現象(林祖嘉、江澤明 2007)。而職棒票房不佳令球團重新評估盈虧與投資報酬率的同時,轉移經營權、倒閉或解散球隊的風險,則由職棒球員承擔。以2008年被除名的米迪亞暴龍和解散的中信鯨為例,即是原住民比例最高的兩隊。當原住民成為職棒球員,被吸納進資本主義市場的消費邏輯中,必須承擔不平等的勞資權力結構,由於欠缺協商和抗衡力量,僅能從屬於資方球團的管理法則。

22 對比後可發現臺灣的學齡球員進入職棒的機會其實較日本和美國要高。以所有球員進入職業球隊的機率來說,臺灣、日本與美國的流動機會分別是:6.2%、0.1%和1%。大學球員進入職業球隊的流動機會,臺灣、日本和美國分別是:15%、0.5%、10.5%(郭振生 2009:50-65)。

除了承擔票房衝擊，原住民職棒球員更面臨對生涯短暫與轉業困難的風險。臺灣本土球員的打球職涯平均4.62年，其中野手為4.84年、投手為4.2年。球員進職棒的平均年齡為26歲，平均退休年齡為30歲，超過半數不到30歲便退出舞台，職涯能打10年以上的球員不超過5% (Chu 2007；林祖嘉、江澤明 2007)。²³而打球所要求的技能在勞動力市場上則用處極微。過去，退休球員幸運者轉任教練，北市養工處和水利處是退休球員的大本營，修補馬路和在抽水站監看水門，讓曾經意氣風發的球員無法人盡其才。²⁴更多球員投入打擊練習場兼差、賣小吃、擺地攤、搬運工、水電承包工、賣便當、開餐廳、學校工友……等出路。曾在球場上耀眼光鮮的球員，反倒遭逢退役後無所從去之困。²⁵

(四) 巨棒之路：族群不平等下的社會流動

進一步檢視職棒僱傭體系和全球化的發展，對比臺灣旅外球員的原漢族群差異，原住民球員到國外發展有所成者較少，加盟年資短且離職率高。臺灣職棒球員的原住民比例達四成，但旅外比例不到三成。旅外原住民球員平均加盟年資為3.62年，漢人球員為4.81年。在離職率方面，旅外原住民球員53.8%，漢人球員46.8% (林文蘭 2010)。原住民球員在中職表現優異，出國發展反倒受限，原住民教練或球團管理人才

-
- 23 據統計，美國運動員的職涯平均不到5年 (Coakley 2007)，二十世紀的大聯盟球員 (不含投手) 平均球齡為5.6年 (Witnauer et al. 2007)。美國擁有完整的小聯盟、獨立聯盟系統和多元的運動行銷管理產業，臺灣球員的專業出路較狹窄。進一步比較各國職棒球員在2008年的平均年薪，美國大聯盟約8,300萬，日本職棒約1,100萬，韓國職棒約300萬，中華職棒不到200萬 (《中國時報》2008年11月22日)，臺灣的新資待遇偏低。
- 24 職棒球員退役後轉任教練比例最多 (學校球隊占40%，專業球隊占18%)。轉任北市養工處則占24% (Chu 2007)。
- 25 面對此種職涯短暫與離退之困，須改善不利於球員的職棒勞動體制，協助球員規劃生涯轉換跑道，設置退役球員轉任運動教練的轉銜平台，建立基層教練的人才資料庫，以免虛擲棒球人力資源。

比例偏低。原住民的棒球成就僅表現在國內職棒從業比例的顯著，在全球化棒球版圖和位居管理階層的機會仍居劣勢。

直言之，棒球對原住民產生正反並存的效果。學習挫折、經濟誘因、社會支持網絡、部落文化的社會結構，諸多因素促使職棒明星變成原住民孩童嚮往的志願。當生活中許多夢想的實現過於遙遠，橫阻在眼前達成學業成就的障礙太多，打球作為獲得社會聲望和經濟利得的方法，打造一條成功的夢幻公式：打棒球、奪金牌、當國手、進職棒。一旦脫貧致富的原住民職棒球員顯而易見，社會流動存在的命題即被維持，更反映出社會的開放機會結構一少數人的成功再生產多數人心中的社會流動信念。身處族群身分和社經地位的雙重弱勢，原住民把社會流動契機寄託在成為職棒選手此種機會有限的社會位置，投入(多為阿美族原住民)競爭的運動機會結構和有限的職棒球員需求市場。

打球作為原住民向上流動的圓夢階梯，在地位取得更呈現兩種樣貌一邁向專業化之路、受限的替代出路。成者，晉升短暫職棒生涯，現身媒體成為下一代的參照典範；敗者，進入分殊化的謀職範疇，維持部落壘球的交誼活動，甚至將圓夢希望寄託給下一代。社會再生產的循環歷程，令原住民的棒球夢得以傳承繁衍。原住民打棒球造成族群謀職的社會堆疊和類聚趨勢，更建構出一條原住民競爭有限空缺的存活淘汰鏈。

此外，特定族群卓越的運動表現，會提供一種穩固和再生產的形象。首先，少數族群的運動成就被用來轉移關注或扭曲在社會中所持有的族群不平等。其次，被用來合法化在其他社會領域中既有的族群不平等，甚至作為社會流動沒有族群藩籬的例證。最後，少數族群運動員的形象更被賦予族群化的刻板印象(Hoberman 1997; Hartmann 2000: 237-238)。透過球場上的優勝劣敗，換取社會流動的機會，汰弱留強的適者生存之道同時展現在「紅土上的運動機會結構」和「生活世界的就業機會結構」，致力取勝求存在無數的比賽、升學和謀職中被不斷再現與實踐。

五、紅土上的訓練體制

(一)訓練時空和軌跡

1. 典型訓練

每天早上上完課，下午一點半仍得參加實習，三點半再到嘉義棒球場練習，一直練到天黑才結束。總是要練到晚上八點才回學寮休息。週六下午與沒有比賽的週日全天也都要練習。(嘉農校友會 1993:113)

前引文是日治嘉農的原住民球員練習實況，類似現今訓練模式。球員透過長期訓練提升體能、鍛鍊球技、培養默契和演練戰術。例行的練習與賽事，切割原住民球員的學習週期，導致其投注學科的時間不及一般生的一半(見附錄)。²⁶

訓練作息可分為：一日流程、一週課表、訓練週期和年曆。「上班」是原住民球員對參與訓練或上場比賽的別稱，「下班」則意味著結束訓練或被換下場。初抵球場的衷心問候(喊出「wish」、「球場好」)、離去前的感恩(喊出「謝謝球場」、「球場再見」)、放置私人物品(依年級區別)、扛抬集體球具、敬慎有序的排列球具、灑水安定紅土飛塵，均為訓練前的運動儀式。制度化儀式作為無形的控制機制，開啟世俗生活／神聖運動的時空分界，也建構出球員的訓練例行和運動信念。

每日訓練流程有四大階段：首先是預備期，進行灑水、擺球具和熱身。其次是訓練期，操練訓練課表。接著是緩和期，透過收操按摩，舒緩痠痛與僵硬的肌肉。最後是休止期，檢討當日訓練心得、精

26 多數球隊每天訓練三小時以上，部分球隊於05:30-07:00晨操。賽季前則有夜間練習、假日集訓或移地訓練。少數球隊於賽前兩週會全天公假練習，學科成績則採「彈性評量制」。

神喊聲、收拾球具和球場。

一位球員的拖延未必會耽擱球隊訓練的開工，隊長或學長隨時叮哨，操控熱身隊伍的開跑時刻，一切以集體作息為準。遲到球員會被施以訓誡、處罰與獨自熱身。熱身之際罕見戰歌，僅夾雜喊聲（哦嘿！）。訓練前喊聲常由隊長或學長帶領，它是身體語言和權力的展現，藉由旋律改變熱身項目，也讓球員集中注意和凝聚士氣（林文蘭 2011）。

在繁重學業之外，球員肩負著訓練重擔與繁忙節奏。十二歲的阿美族投手 *Ginjun* 記錄他從下午兩點到晚上九點的作息是：

今天下午我們先跑三圈在做操，之後就去衝刺衝了七次，然後我們投手就去室內練投十五顆內角十五顆外角 10 顆變化球，投完以後我的手就很痛。我去跑輪胎時我有點吐，跑完五次後就去整理四周。打掃完後就去吃晚餐，吃完後就去拿書包回宿社，快七點的時候就去球場了，去那換鞋拿手套拿球幫學長丟球，打鐘時我們還一直練習，九點我們就收球休息了。（G-117[12]）

Ginjun 結束夜間練習後，返回宿舍洗澡、洗衣、打掃、晚點名、抽空鍛鍊體能、十點熄燈就寢。

而布農族 *Huli* 被挖角到西部職校打青棒的作息則是：

高二是日校，然後一年級跟三年級都是夜校，那一三年級都是餐飲，那二年級就是什麼觀光科啦什麼餐技啊。有的時候是早上體能下午訓練。要不然就是早上練球下午重量。然後晚上上課。（I02：18）。

冗長密集緊湊是典型訓練的特點。加倍操練更出現在地區代表隊的集訓期，球員得適應新的訓練環境、課表和週期。課業擺一旁，練習擺中間，照三餐無止盡的練練練。*Guai* 指出九〇年代的組訓狀況

是：同學彼此開學見一面，休業式再打招呼。

大概在國二卑南國中有打世界冠軍，接下來也有重要比賽。所以國三的訓練幾乎是整天公假。早上起來做完操就開始跑四百的操場二十五圈。做完後還有時間就動態操、跑壘、衝刺。然後就吃早餐到七點左右，大概八點再開始練習，大概練練練，練到中午。然後休息換裝再去吃飯，吃一吃回來休息大概到一點半，又開始練練練，練到下午五點半。然後去吃飯回來又開始晚操。晚上就做體能或練習。到了八點半就開始盥洗。(C0201:9-10)

球場訓練是招式的精熟和升級，體能鍛鍊則是增強球技的效能避免傷害。球員會藉由輔助器材的重量訓練，強化肌群增進爆發力、肌力、耐力和肌耐力(見表四)。

(表四)一位阿美族高中捕手的一次重量訓練課表

項目	次數與頻率	項目	次數與頻率
仰臥推舉	40公斤45下	背肌	X
大腿伸踢	45下	立姿側彎	30下
立姿雙臂捲屈	36下	仰臥起坐	100下
舉踵	100下	反握手掌捲屈	150下
側握上拉	40下	伏地挺身	75下
俯臥腿背彎舉	X	正握手腕捲屈	150下
坐姿上舉	X		

資料來源：A-65[17]。

訓練過程具備標準化的程序，亦讓渡出部分的自主空間。以強化肌群為例，訓練項目標準化全體一致，但具體執行則是量身訂做(如：不同守備位置)，或評估體能而有差異化課表(如：次數和組數)。球員彼此會炫耀體能(如：調重磅數、增加頻率和速度)，更會偷練增強體能。

整年的訓練流程會搭配關鍵賽季，針對球員的身體能力而有 殊異化的加工需求。運動年曆可分為：(移地)訓練期、加強期、比賽

期、調整期、準備期。結合了個人訓練課表和集體協作課表，使球場訓練和分工順利完成。在高頻率的身體勞動中，輸入量難以算計，輸出量亦無法衡量。球員的身體作為運動生產工具，在高度操練下更需要定期保養、傷害防護或維修療癒。

2. 逐比賽而居

原住民球員以賽季週期作為學習的行事曆。環台各地的球場和流動於各種運動空間塑造出其所熟悉的「運動文化」，而不是重視靜態書本知識的「智識文化」。球員置身於多元流動的競技空間，在各種移地訓練環境之外，青春期的原住民球員最常造訪的場地有：台北天母、新莊和重新、新竹中正、台中洲際、雲林斗六、嘉義縣市、台南統一、高雄澄清湖和岡山、台東棒球村、花蓮德興、宜蘭羅東球場。這些場域是學齡球員邁向運動專業化舞台的前哨站，無論是驗收訓練成效、比賽勝敗、戰績優劣、升學機會、球探測速槍的青睞……，璀璨發光與黯然退場同時顯現其中。每回的上場機會都比課堂考試來得重要，這是讓原住民球員被關注的舞台，而不是令其學習挫折的案牘。

原住民球員逐比賽而居的異鄉居所包括：花蓮港天宮和嘉義東石配天宮的香客大樓、嘉義縣凱悅汽車旅館、嘉義市萬泰飯店、台北縣板橋體育場、台南市哥爸妻夫商務飯店、高雄岡山太陽城旅館……，或委身於汽車旅館、球場看台下的通舖或鄰近學校的宿舍和教室。球員外出參賽曾落腳住處比例最高的是飯店或旅館，其次是廟宇、體育場或國軍英雄館。頻繁外出參賽更造就出「比賽擬似校外教學」的認知心態，「真希望可以一直比賽，不用回學校」，比賽「就像度假一樣」、「在外面比賽比在學校自由」、「不會被約束」。此種逐比賽而居和比賽像度假的氛圍，讓原住民球員座落在「訓練為主學科為輔」的學習時空脈絡中。

(二)成為紅土戰士

南王國小目前有一百卅八名學童，平均每年級只有廿多人。學校人數少，打棒球又須自四年級開始，所以南王稱得上是「男生皆兵」。只要球隊去練球，四年級以上的班級，留在教室的幾乎清一色是女生。（《聯合報》1995年12月13日）

在動員全校「好男打球去」和嚴訓之下，南王國小於九〇年代打造出多座冠軍。²⁷九〇年代的台東在組訓密度和聯賽參與度都居全台最高，被稱為「少棒縣」，蘭嶼也成為「少棒島」（《民生報》1991年1月6日）。原住民球員更蛻變為集中住宿的運動戰士。

1. 運動社會化

運動社會化有兩種面向：一、導向參與運動的社會化，使行動者進入運動領域的角色、關係和社會網絡的過程。二、透過運動而達成社會化，對運動參與者的態度和人格產生的效應（Leonard 1998: 107-113; Nixon and Frey 1994: 87）。藉由勾繪原住民如何學習成為棒球選手、扮演運動角色、內化運動邏輯和適應隊友互動，可初探其在邁向專業化舞台之前，如何建立紅土上的運動人格、互動邏輯和團隊秉性。

棒球作為男性化的運動，球員的互動處於敵對合作（antagonistic cooperation）的狀態，在團隊協作中潛藏競爭。此種運動結構關係使球

27 「好男打球去」常出現在朋友之間的打球招攬。曹錦輝當初加入球隊即因同學激他：「男生就是要打棒球，不打棒球就不是男生」（高永謀 2005：85）。曾任南王少棒教練的陸永茂也提及：「練球時，全校教室內只剩兩個男生：一個小兒麻痺，另一個氣喘」（《聯合報》1998年1月2日）。打球是原住民男孩的第一志願，除體能不適者，南王國小的男學生即是棒球隊的代名詞。此種情形同樣出現在紅葉國小，曾是第一代紅葉球員國中同學的余賢德校長，任職紅葉期間欲掙脫棒球包袱。2009年新校長到任後推動棒球運動，積極向鄰近學校挖角，球員的學費全免且供食宿，造成轉學生過多導致課桌椅不足。目前全校約50位學生有26位球員，扣除女生後也是男生皆兵。

員建立任務導向的聯繫，阻礙親密關係的發展(Fine 1987)。占據不同位置的球員扮演分殊的運動角色，更決定其所擁有的運動資本，這是跟教練和隊友的協商手段和鬥爭武器，更是球員彼此競奪之物。球員逐漸在其所處的運動位置和競賽場域中，養成特定的競存秉性，銘刻出實踐慣習。

學習內化團隊運動的階序互動邏輯，是球員的必修學分，例如：在運動心態和隊務分工方面，菜鳥如何逐漸融入新球隊，漸進升級為學長，老鳥又如何展現其運動管理者的角色(見表五)。年級階序與先來後到決定座椅空間的配置、勤務分工和訓練順序。學弟是最底層的勞役者，需忍受最早到場最晚退場和輪值收拾場地的待遇，學長則掌握訓練的優先權或指導權。

(表五)運動社會化的階段

年級	一(學弟)	二(學長/學弟)	三(學長)
運動心態	苦與勤	夾心餅或三明治	涼與閒
運動角色 任務	底層勞役執行者 底層運動小工 受化者、學習者 被管教對象	協同勞役或監督勤務 副隊長的選拔 施化/受教者、教導者 督導者、管教學弟	任務指派與分配 隊長的選拔 被認同或模仿的對象 資深指導者、管教學弟
運動心理 需求	安全感 融入群體的需求	需要被肯定 自尊自重	獨立自主 尋求發展機會和舞台
發展特性	學習熟悉運動環境、訓練生產流程、球隊文化	學習賞罰學弟的規範 配合與維護球隊文化	學習領導管理 執行隊規並保持隊風

資料來源：田野觀察彙整。

戰術的內化更是運動社會化的焦點，促使球員能在教練下達指令後執行攻防戰略。關鍵賽事的暗號均會重新更換，當球員拿到暗號單時，會手比暗號銘刻於身體記憶，或在訓練日記反覆抄寫身體部位所指涉的暗號。在平常的練習賽或運用戰術的打擊練習，模擬暗號操練戰術以提升執行效率。教練們認為戰術運用透過玩遊戲能達到熟稔效果，藉由操演複雜多變的戰術或故意比錯手勢，混淆球員的辨識度以

增強印象和記憶。甚至透過懲罰讓球員熟記戰術徹底執行，看錯暗號或執行失誤者被處罰原地抬腿報數跑步動輒百下，並遭受其他球員嬉弄，使處罰結合戲謔和體能，讓戰術與暗號銘刻在球員的身體技藝中。

2. 群性慣習

集中住宿是多數中學球隊的管理方式。棒球運動中的球員隸屬於團體之內，沒有團體就無法競賽更遑論成績。棒球是封閉性的運動，隊友間的角色互動和訓練投注有其內在運作邏輯，從而養成球員的運動價值觀和群體慣習。

團體化的心態與生活節奏是棒球運動的特點。南王少棒的家長認為教練規定球員必須團體生活，讓他們憶起從前族內施行的勇士鍛鍊。卑南族會所制度強調年輕人忍耐、服從和尊重長老的個性，有助於打造團結(林炎嘯 1998)。團體目標先於個人利益，讓球員習慣集體思維勝過個人意見，把自我置放在團隊的參照架構下，是塑造眾志一體的關鍵。「棒球隊是一個團體，如果只有一個人打的很好，那也沒有辦法贏球。如果棒球沒有團結的話，那就不叫棒球了」(F-62[13])。打造同梯感更是榮辱與共團結合作的必備條件，此種團隊思維的慣習如何養成？又有什麼樣貌？

在集體住宿的環境中，若球員編在同班或宿舍同區，互動圈狹隘緊密，可謂學習、訓練、吃飯、洗澡、睡覺都同在一起。不管意願與否或為了省時、同樂，球員共浴洗澡極為常見，甚至打起水仗把蓮蓬頭拔掉用橡皮管亂噴。以HS國中為例，先前球場沒有熱水，只能洗戰鬥冷水澡，大夥共浴速度快又好玩便不怕冷。在TY國中亦然，冬天沒有熱水加上浴室沒門，隊友彼此拿臉盆互潑。集中住宿的紅土戰士，提早在青春期實踐阿兵哥袒裸共浴的文化。

共享文化則體現在飲水、共食和互用，自己的私有物變成集體的公用物。不告而取是常見之事，較具個人界線意識的球員，在球衣、

球褲、球帽、內褲和襪子會縫線或塗鴉，擔心被不分你我的隊友挪用。更有球員指出若物品不見被偷，就再去偷別人的回來用。共用是兄弟情誼的分享，與被竊絕緣則取決於身分階序或隱疾。學弟的物品被偷機會最高，學長或染有疥瘡等皮膚病球員的物品失竊率較低。綜論之，集體行動、同宿共食、生活相依度高是養成群性慣習的養分。

3. 集體連坐

棒球是榮耀共享犯錯連坐的集體運動。犯錯雖是個人責任，但會採行連坐罰，形塑出一人犯錯株及同梯的共同承擔觀念。球員的生活慣性也展現在集體出遊尋樂，若有人玩樂失當，旁人未盡糾正之責亦會連帶受過。

記得最嚴重的一次是因為南王開了一個電動玩具場。然後裡面有賭博性的電玩。後來教練知道以後我們就被打，用棒子的尾巴握把就這樣子打，因為有人去玩那個賭博性電玩。(全隊一起被打?)全隊。國小其實要求就很嚴格，就常被打。(C0201:6)

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戰績勝敗集體共享，隊友有過共同承擔，甚至是自己沒錯，但會想像同梯有人犯錯才遭受連坐罰。即便自己認真練習，但未從旁提醒其他球員不得怠惰，大夥連帶受罰。同梯隊友的情感發酵和相互監管，在連坐處罰制度中漸然生成。

學齡球員在不同階段或多或少遭遇過管教失當之例，背後毋寧凸顯出幾項訓練困境：教練一方面承擔帶隊績效的壓力、二方面扛負管教的職責、三方面承受學科老師指責球員無心學習。許多棒球教練全心投注訓練，對球員付出不求回報，但多數置身於毫無保障的勞動條件，落入沒成績就丟飯碗的風險。一旦教練轉換球隊頻繁或被解聘，對於「擬似師徒制」的培訓過程往往付出極高的代價，教練和球員均需重新適應，無法造就良性的組訓品質。

(三)訓練過程的不確定性

一位原住民職棒球員的生產流程，從招募新球員開始，藉由運動社會化使其具備不同層次的體能、技術和心態，在各種賽事的參賽名單選拔中，篩選、分類和定義其運動能力。當賽事結束或畢業，汰選到下一個階段的紅土球場，如此循環反覆生產出職棒球員的成品。然而，訓練過程往往會遭遇各種危及訓練的威脅和不確定性。

1. 分裂化：挖角的威脅

每年四月到八月的地方代表隊和國手選拔賽，為組成夢幻球隊，代表隊會彼此借將。各隊的優質球員短暫出借給奪得組訓權的球隊，但借將會招致球員受傷或被挖角的風險。

同時擁有青少棒和青棒的球隊，雖可達成接力組訓之效，也可能發生整梯青少棒球員被其他球隊綁走，引發青棒球隊的解組危機。我所觀察的田野在2005年某位優秀教練被新球隊挖角致使多位優秀球員轉隊。在多方角力下，幾位球員被挽留球隊才不致解組。2009年另一位多年前曾任職的資深教練被徵聘到新球隊，挖角劇碼再次出現。各隊美其名借重教練長才而禮聘，實則估量可連帶綁走的球員。此種教練球員之間擬似師徒制的訓練特質，使得教練跳槽球員轉檯，球員成為教練的私有財，並讓球員承擔球隊解組、轉隊風險、未獲佳績與升學機會的衝擊。

僅有單一教育階段的球隊則易被外縣市球隊集體挖角，這主要立基於教練人脈和社會網絡。「TY國中像今年OOO來兩趟啊。他一直希望說能夠整批給他啊，TY國中是不可能嘛，因為前幾年都跟CA有個默契，球員他有可能到時候會大部分給CA，然後小部分給KY」(I0301：4)。兩隊教練彼此熟識，便把球員綁走接手訓練。

早期因為台東沒有什麼正規的國中棒球隊啊，所以你一定要往外

送啊。後來因為國高中地方都有了，挖角風很厲害滿嚴重的。家長比較在意的是說，他是不是可以收一些錢啊。因為原住民因為生活都不是很好嘛，那可以收十萬就算十萬，可以收二十算二十。(I0301:15)

透過金錢買斷球員去向，在球員訪談亦獲證實，收錢對象卻是教練。Lotong提到有幾屆學弟遠赴西部CA青棒的原因是：

被拉過去。因為教練跟CA很熟，然後就說什麼賣球員這樣。(真的?)是教練說的。他們下一屆也有被拉過去的啊。就過去然後再給你錢這樣子。(給誰錢?)教練啊，聽教練講的啊，分一萬這樣子。(H08:8-9)

由於集體挖角所費不貲，須打點家長和教練的費用，加上給球員器具和補助金，因此，原住民球員簽下不平等合約遍存於多數西部青棒隊(見圖五)。

<p>切結書</p> <p>本人____就讀於○○高中，並參加○○高中棒球隊，一切服從教練之管教及遵守校規，期間所接受的所有優惠及所有裝備，爾後若退出或轉出棒球隊時，應予退還所有優惠金額，及賠償所有裝備費用。為恐口無憑，特立此書。</p> <p>此致 ○○高級中學 立書人 學生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聯絡地址： 監護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p>
--

(圖五)紅土上的優惠暨不平等切結書

多數球隊避免球員集體跳槽的防堵策略是：扣押畢業證書或績優獎狀、解約需償付賠償金、遊說家長、拒給離隊同意書。

就是他們IF的教練下來拉人啊，然後那個學長跟我們講說那是三年合約，不能轉這樣，轉了就要罰。（罰什麼？）賠錢。（賠多少有寫嗎？）就是三萬多塊。（那時候你有簽嗎？）我有簽啊，因為IF教練請我們去吃飯嘛，那我們全部都簽了啊。如果已經開學進去了，要轉的話就要先賠錢，然後畢業證書啦都要扣留。（I02：19-20）

這位布農族游擊手 *Huli* 遠赴西部球隊待一年適應不良休學。賠錢後拿到畢業證書報考另一間新球隊從高一讀起。因他被舊球隊登錄報名賽事，又未拿到離隊同意書得等兩年才能上場。在球隊的文化差異、教練帶隊風格和生活不適應的多重擠壓下，原住民球員中輟休學或轉學案例不時可見。青春期的球員提早被約所綁，中途不打退隊得賠償。他們致力訓練競爭升遷機會，更身陷分裂化與挖角風險的折衝，將單純的打球夢想質押在成人世界複雜的社會網絡和利益糾葛中。

立基於教練網絡的挖角是團隊運動的招募策略，由球員概括承受不平等的遭遇和禁賽風險。教練未能捐棄本位主義與過往利益衝突，僅仰賴金錢、人脈與關係，未站在球員的素質條件提供升學諮議，無助於球員在棒球專業的發展。球隊遭遇分裂化更來自教練被挖角，高薪挖角教練便可綁住球員，再以帶隊成績作為評估和考核。例如：一位台東教練被挖角到外縣市，導致基層球隊解散，教練再回過頭綁走台東球員。

因為CD是看上他可以帶台東的選手出去，所以給他比較優的條件。（台東的教練薪水都不是很穩定？）對，快一萬多塊。像PN國中之前那個L教練也是啊，一萬多塊啊。臨時人員大部分就是那個薪水，一般都是一年約吧。像TY國中的話，那個W他情況又不太

一樣。他是縣政府臨時人員，不過學校又給他舍監啊，所以一個月大概三萬多塊，住宿的大部分都是棒球隊嘛。(I0301：18-19)

教練工作無法獲得穩定聘僱，致使職務不穩定與流動性高，造就球隊無法常態訓練和球員學籍的流動。而教練跳槽球員轉學的「聯動效應」，易促使球員淪為被教練隱形綁架的所有財，無法慮及球隊解組風險和球員最適的發展需求。直言之，由於聘約不受保障，教練淪為校方工友、短期約聘、後援會或家長聘僱的臨時工，令原住民基層球隊的運作落入「球隊沒成績、教練失業、球隊解散、球員沒球可打」的惡性循環。競技成績始終是棒球組訓致力追求的果實，敗戰教練離職更成為訓練過程中潛藏的危機。

棒球隊的服從、團隊合作和拼鬥精神……等運動人格的養成，是許多後援會無悔支援的關鍵。但集中住宿的訓練環境和學習生活圈的狹隘，造就出「球場如家、教練如父、隊友如家人、球隊如軍隊」的球隊文化。甚至在家長疏於管教或外出就業導致隔代教養的背景下，棒球變成陪伴原住民學童成長的好朋友，球隊成為相濡以沫和管教的社會化機制。隊務管理在無形中會形塑球員的品性，教練扮演的角色不僅是訓練球技的技師，更是塑造品德的人師。

臺灣自2010年致力建構新的棒球教育藍圖，政府跨部會組成的「振興棒球專案小組」，對學生棒球組訓開出四帖藥方：三級球隊四年內倍數成長、棒球普及化、專技教練制、舉辦甲子園比賽。然而，關注球隊數量的提升、賽事的增加和拓展贊助資源之餘，更需慮及教練工作權的保障和專業養成，徹底檢討和改善學齡球員的學習權益和訓練條件。

為促進棒球運動的發展和人力資源的良性循環，臺灣的棒球教育有幾項改革的方向。第一、落實專任運動教練制度。教練工作的聘僱穩定，球隊才能常態化組訓，有效降低球員的轉學流動率。建構教練

定期專業進修的課程或營隊，亦可提升帶隊的專業素養、訓練計畫和良性管理。第二、經費來源的穩定和持續。鼓勵民營機構長期贊助或認養基層球隊。經費不足始終是東部和基層球隊運作的困境，各校球隊尋求贊助須各憑戰績和本事，致使西部財團球隊輕易進行球員挖角。第三、貫徹三級棒球潛力球員的專業養成與運科培訓，土法煉鋼投注鉅量時間只會讓球員荒廢課業和運動傷害。第四、整合教育規劃和人力資源，設置棒球重點發展學校，提升留住優秀人才的制度性誘因，減少在地人才外流比例。直言之，東部原住民基層球隊不斷歷經組訓、停訓、再組訓……的不良循環，耗損球隊的營運成本，更不符合人才培育的經濟效益。

2. 商品化：金錢的力量

組訓一支球隊所費不貲，除了場地維護、添購球具的例行經費，比賽費用杯水車薪，不是仰賴募捐就是家長贊助。多數東部球隊幾乎均曾遭遇營運不善被迫辭退教練或停訓命運。當東部球隊面臨組訓困境之際，仰賴的救命仙丹就是媒體，但卻塑造與強化原住民球隊等待援助的弱勢意象。然而，仰賴媒體募款模式的邊際效應只會遞減，主管機關的經費編列原則更無法被徹底檢討和補實。

此外，棒球訓練過程涉及不同角色，包括：球員投注訓練鍛鍊球技、教練的訓練規劃與社會關係、學校的組訓經費、後援會或親友團的物資和支持，都是讓訓練常軌化運作的要素。較特別的是，獎助和贊助系統所挹注的資源，球探與經紀人所提供的簽約機會，兩者是促發紅土上商品化的關鍵。

原住民球隊接獲贊助常出現在兩種時機：一、貧困訓練被媒體揭露為紅葉精神再現，吸引蜂擁物資。二、當球隊奪下佳績或球員一戰成名，各方的利益競逐和委託廣宣的贊助湧現，近十年已從青棒延伸至青少棒與少棒提早綁樁。單純的學生棒球運動，在家長和教練樂見

其成的允諾下，球員的戰力提早進入標示身價的商品化歷程。

而球探或經紀人不僅出現在各種賽事場合，目前更深入花東基層學校佈線，向原住民球員宣稱可接洽出國打球、協助談妥職棒合約。這些行動者包括：個體戶的仲介、知名的運動經紀公司(如：日本KDN、美國SBC、IMG、WMG、CSMG)的業務代表、國外職業隊駐台代表(即球探)、退休球員或教練、現役教練或裁判、知名球評、醫生、球員保母。透過贈送繡有球員姓名的手套或營養補給品，漸進鞏固社會關係。球探三不五時的探班，造成球員之間的比較心態，更成為教練訴求公平推銷和刺激球員競爭的籌碼。

每個都帶測速槍來啊！但是跟我們接觸比較久的是紅襪的。然後像雙城的、洋基的、遊騎兵的都有來學校看。我說新生代殺手也不錯啊，那個Panay也不錯，包括那個野球鐵人我都叫他們投。其實教練沒有偏心，教練我都推銷了。這樣子的話對他們來講就是刺激的影響力。(C03：19)

原住民球員的打球夢想，更充斥著競技獎金的分配衝突。針對球員的競賽成績發放現金，促使保管帳戶的導師錙銖必較，適度拿捏球員的提領額度。有多位導師均不贊同發放現金，應改為就學補助或非金錢形式的獎勵。即便導師努力堅守球員獎勵金，仍不免遭遇球員拿出家長牌當令箭或家長越位討錢之局。導師必須引導球員適當的金錢使用習慣，甚至當教練欲瓜分獎金，示意球員捐助當作酬謝，導師更得從中把關維護球員權益。作為球員獎金守門人的導師，必須與球員、家長和教練相互拉鋸，透過合縱連橫，讓獎金能流向有益又分配歡喜。長期擔任原住民球員的導師Cyuan指出，金錢是參賽機會和利益衝突的導火線。

有的家長可能就是我出多一點錢，那我的孩子的術科成績並不是那麼好，但是因為我平常跟每個教練關係比較好，你們活動比賽我都有資助費用。那這樣孩子報名了之後會產生爭議出來，對其他的選手並不公平。(T02：12)

家長的贊助或私下的利益輸送影響參賽名單，先發陣容取決於球員球技和家長與教練的社會關係。有球員指出當球隊中兩人球技不相上下，只要球員的家長與教練關係良好，其擔任先發機率較高或出場時間較久。深諳台東基層棒球生態的裁判 *Kacaw* 也提及，教練與家長時常吃喝一掛，在帶隊訓練和擬定名單就不具信服力，甚至讓球員質疑或不滿。

他本來經濟就不是很充裕了啦，所以說他一直以來就是利益，利放在前頭嘛。包括他帶球隊，他那個 order (攻守名單的日語發音) 不用寫，我就知道他的先發選手，都可以用猜的，固定的啊。就是家長有跟他吃喝，那些就是固定上場的啊。(I0302：3)

台東基層教練與家長吃飯喝酒的風氣由來已久，賽畢在現場喝酒或私下覓地續攤，這營造出教練與後援會的熱絡情感，也對球員造成不良示範。*Kacaw* 指出私下利益會阻礙檯面上的紀律和球風，間接造成球員耳濡目染，甚至當球員被挖角到西部，在沒有教練監督和家長管教下，易落入喝酒礙事之局，成為阻礙常態化訓練的最大變數。

(四) 打出意識形態的監管機制

訓練現場有其政治性的要素，包括：訓練的政治性規範工具、訓練過程的政治性效應。訓練過程所蘊藏的意識形態效應，包含三個面向：

學長制打造階序意識、競賽遊戲打造虛假意識、追求超越打造苦練意識。

1. 學長制打造階序意識

學長制(hierarchy of seniority)是基於輩分倫理形成的紀律規範或管教制度，功能是促使訓練、分工、競賽和管理有所依循。學長扮演的角色是：資深的長輩、領導管理者和經驗傳承者(洪知俊 2008)。球員之間的學長與學弟、教練之間的賢拜與後輩的互動邏輯，是棒球運動文化的核心，學長制是鍛造階序意識的基石。

立基於進入球隊先後次序的長幼倫理是學長制的原型：學長、同梯、學弟。不管論歲、論輩、論球技，在球員心中均會標誌和評價其他球員相對於己的社會位置，這會影響對方的聲望高低和敬重是否表裏如一。講求紀律和榮譽的球隊，把訓練學弟的責任交託給學長。透過一梯管一梯，最低的梯級其上必須服從的管教者最多。學長不僅傳遞訓練模式的系統，更是學弟模仿和糾錯對象、技術指導和角色典範。

在所觀察的田野中，球員贊成學長制占67%，不贊成占33%。在他們待過的球隊中，曾被學長要求從事違反意願的行為比例有58%，包括：洗衣、曬衣、按摩、拿東西、買東西、做私事、跑腿、借衣服、操體能、做白痴雜事、被打。曾遭遇不當對待的球員仍贊成學長制有35人，高達67%。理由是良性指導關係可建立球隊的紀律、榮譽和文化。但越是在當下遭遇到極度不公對待的年級或球員，越不贊成學長制。

球隊的團隊規範和文化的養成相當仰賴學長制，更落實在球隊的訓練流程和庶務分工。階序互動在球場中隨處可見，也體現出訓練的微觀政治，致使學長制所訴求的敬上之道和絕對服從，成為正當化霸凌欺侮和戲謔行徑。學長制作為社會互動邏輯有三種表現層次：

一、學長有事學弟服其勞。使喚學弟跑腿拿球員或倒水、充當貼身服務生或球僮最為常見。學弟往往被學長使喚不得閒，不堪其擾才稟告教練解決困擾。結局往往帶來更需索無度的報復行徑。

二、交換關係搏感情。*Guai*回憶十多年前學長的行徑是：「會帶我們去買東西，然後再叫我們洗衣服，我們就心甘情願」(C02：38-39)。*Laway*對學弟的策略則是：「今天我很累，那學弟你幫我洗一下衣服。然後隔天比如說去買東西的時候，會去找學弟一起去買飲料」(H1002：7)。自願洗衣可活絡社會關係，有難時刻學長更會出面庇護。此種交換只要雙方合意就能打造良好穩定的關係。

三、展現威勢的霸凌。²⁸阿美族球員*Lobok*自HS國中畢業後到西部SH家商打球半學期即中輟，由於實力好的新生會被球技差的學長惡意刁難、操體能和體罰。甚至命令學弟手洗衣物或由學弟出錢丟洗衣機。國小階段是台東頗富潛力的阿美族投手*Mayaw*，在國一也曾洗過多位高中學長的衣服：「學長會叫我們按摩，然後洗衣服，光洗他們的衣服，就洗到一兩點」(A0101：8-9)。洗學長衣物的風氣，造成「一梯壓一梯」的文化傳承，球員被潛移默化此乃合理之舉。在許多教練眼中會默許的行徑，學科老師卻覺得不可思議。

LCW那時候就找國中生去幫他洗襪子啊、洗什麼這樣子。他也就說：「那之前學長都是這樣子」，他認為理所當然，他的反應覺得他並沒有錯那麼多。(因為他以前也洗過?)對。他沒辦法完全接受說，這樣的行為其實是不對的。(T02：10)

棒球場域的社會組織原則由兩種特質構成：強調「先賦地位的年齡級別」和「成就地位的球技能力」。既崇尚學長制的階序互動，更奠基於球技來決定出賽機會和在球隊的地位。欲辨析學長制和球技階序，

28 原住民球員所遭遇過的霸凌行徑包括：學弟被打罵貶損自尊不得還口還手、宿舍沒熱水時須到幾百公尺外提熱水供學長洗澡、唱歌搞笑娛樂學長、惡意操體能、貼錢買雜物、私人衣物或裝備被恣意取用、打免費的霸王機、幫穿內褲的學長按摩入睡方可離去就寢、恐嚇丟下窗台、身體傷害、心靈虐待、性騷擾與侵害。

無法脫離所處的社會關係而獨存，更攸關球隊所需的生產力和訓練模式。運動位置的階序作為凝聚我群意識和訓練分工，主導著隊中的權力和資源分配，更發揮社會支持和控制的雙重效果。

球場分工反映運動生產關係，亦能看出不同年級間的階序、互補及球隊的運作法則。從訓練關係觀之，學長制與球技論共同掌控球隊運作的生產資源，兩者亦潛藏矛盾。當學長球技菜，學弟戰力優，遭遇到結構角色和人力資源衝突時，棒球文化機制（如：競賽遊戲和文化展演儀式）可予以緩衝或化解。²⁹在強調公平競爭與絕對服從的規則下，衝突對立難題藉由訓練遊戲和運動儀式，階序和互補身分交融其中，更可凝聚球員的社會連帶打造團結心志。

2. 競賽遊戲打造虛假意識

運動心理的養成奠基於球員熱愛棒球，也潛藏著訓練條件的設計，讓球員自發地喜歡練習，可降低教練在訓練、監督和管理的負擔。訓練的現實是艱苦、重複與冗長，導致沈悶無趣、身體疲勞和運動傷害。面對難以確知的隱形產出，易讓球員心生不知所練為何之感。透過競賽遊戲的情境可調節球員的罷練、疲練和不練的倦勤情緒，消弭艱辛且不確定產出的疑慮，降低訓練過程中的緊張關係。

29 紅土上的喊聲、戰歌和隊舞是棒球文化機制的展演形式，表達出原住民在棒球文化實作的特殊性。例如：採借教會詩歌、唱情歌或原音古謠、依球員特質量身訂做、隨攻守情境變化戰歌、在創意隨興表達之餘蘊藏「揚剛抑柔」的性別文化。喊聲或戰歌的內容不盡然具備競技之意，卻是振奮士氣的同樂泉源。原住民球員在訓練和競賽中的隨遇展演，為冗長訓練和緊繃賽局添加有趣元素，透過歡唱表演，享受情緒沸騰，凝聚集體意識，球場成為原住民文化創生的當代舞台。此外，學長制的權威管教更打造出貶抑和服從的雙重連帶，操弄著實質上的玩樂與象徵上的團結。例如：操體能懲罰學弟、好玩的競速遊戲、吹棒球接力賽、跳餘興舞、玩樂樂棒球、雨中踢足球或美式橄欖球……等餘興活動。透過「寓訓於樂」緩解衝突的生成蔓延，打造隊友情誼，維繫團隊凝聚力。直言之，原住民球員作為棒球文化生產的載具，運動儀式的象徵展演可消弭衝突、凝聚意識、增益生產，成為動員集體情緒、重構社會關係和激發運動能量的催化劑（林文蘭 2011）。

競賽遊戲的功能是：訓練的無聊辛苦與遊戲的好玩有趣，打造出寓訓於玩的苦樂相參，讓球員提升體能、獲得滿足和隊友情誼的發酵，讓教練提升訓練績效，塑造出嚴格和幽默兼具的形象。「**我們就是要讓他們那麼累的當中噢，讓他們去排解他們的辛勞，你就會去用半開玩笑的方式去訓練**」(C01：18)。

競賽遊戲可打造多元的訓練模式，抒解訓練心態疲乏和惰性。競賽遊戲會由教練精心規劃，也源自球員即興創作或抱怨訓練無趣，希望增加遊戲元素：「**操體能時可用競賽的方式，這樣大家不但有練到，又有娛樂的效果，就快樂的過了一天**」(A-99[17])。球員看穿訓練本質是辛苦的，不如創造出競賽娛樂化的形式。競賽遊戲無處不在，激發球員之間拼體能的鬥志，較勁與競速總在不經意中啟動，兩位球員眼神相對假作挑釁便上演遊戲化競賽。此種個人組的競賽，多是感情好、守備位置與訓練課表相同者彼此間的嬉戲。

隨機發生的創意競賽相當多，在體能訓練時刻為無聊練習投注有機活力，或在處罰過程夾帶競賽遊戲的精神，極大化訓練效率。「**昨天我們到球場就開始傳接球，結果漏接的特別多，我本來要做450下的仰臥起座，結果教練Y沙力給我們座兩百下而以**」(F-122[12])。球員感激教練對處罰的折扣優待，矯正漏接的姿勢提升訓練品質。

球員的創意把無聊訓練轉化為有趣遊戲，透過因地制宜變換出各種調劑無聊訓練的有趣節目。即興遊戲未必是針對訓練現場的抵抗，從中打造出非預期的訓練甘願，藉由球員的自由創意和模仿，使場上練習氣氛不生冷不難練。其中常見一種形式相近但內容有異的「活靶遊戲」。例如：某日結束練習的撿球之際，不知由誰突然冒出一句：「**丟Bisazu，丟到一杯珍奶**」。接著同梯隊友十幾顆球同時丟向Bisazu，使他倉皇逃逸，矯健的他並未被眾多「珍奶之球」擊中，大夥就在玩樂中撿完場中逾百顆的練習球。

除了球員隨興的個人競賽，教練也會採取同梯的分組競賽，以激

將法操練出競爭心理。由高年級示範動作，作為突破紀錄的基準。隨即激起學弟挑戰的鬥志，讓學長不敢打混。團體競賽遊戲促使訓練變成計時測速或一較高低的競賽。同梯分組的對抗賽，可藉由組間競賽強化組內團結。讓學弟享受對抗、挑戰和超越學長的樂趣，學長須維持體能優勢，更擔心輸掉競賽而丟臉。³⁰分組的對抗競賽，採取賞贏罰輸的原則，以體能、雜役、賭金和物資作為競奪標的。特別是贏球拿錢輸球被操的對賭，讓球員熱衷練習賽，形塑出學弟力求贏學長輸不得之局，達成訓練和娛樂的雙重效果。

星期六下午，太陽光撒在球場上，使球場像是金打造。學弟向我們放話，教練說PK，這個比賽每一人出10元，放在本壘板裡，比完賽贏的隊伍把錢哪走，10元盃的比赛開始。學弟沒有贏，除了沒了十元，還要接受教練的魔鬼體能。(D-33[13])

藉由布置比賽場景(劃線、全新裝備)、營造競賽氣氛(賭金)，單純的練習賽改裝為正式、好玩、有獎懲的遊戲。而雨天賽事的模擬訓練更是鍛鍊球員不畏天氣、訓練膽大、磨損自尊和建立連帶的時刻。面臨正式比賽更像整軍作戰：「我覺得這次的比賽打得好辛苦，很像在打戰一樣，小學比賽也沒有打得這麼辛苦。我們冠軍賽打的並不好，教練在旁邊看的時候，很像快要死一樣」(F-20[13])。擔任教練的TZ認為打球就像作戰，他認為原住民球員的潛力是：

打棒球其實像軍隊，他就是聽指揮，然後要給他灌輸無比的信心。原住民的小孩子單純，他們會百分之百的完全聽從。其實比賽就是作戰，選手要百分之百的聽從教練的指揮。我是覺得說原

30 常見的群體競賽遊戲有：體能分組接力、樂樂棒球、雨戰、雨林足球、室內球場赤腳接力、趴地吹乒乓球接力、戰歌創意接力……等。

住民他的體能天生就是比人家優越的。但是耶，還是會輸給一些西部就是那種不是原住民的選手。他們差別就是差在於頭腦，他們就是比較被動。(C03:4)

原住民教練認為原住民球員體能優越和想法單純，在訓練、抗壓和戰術執行極為重要，具備聽命服從的特質可創造優異的表現。綜論之，打球的艱苦訓練被原住民球員改造為創意的競賽遊戲。一旦遭逢比賽，打球更變成作戰般唯教練是從。在遊戲、競賽和作戰的轉換之間，藉由教練精心安排和球員隨興創意的競賽遊戲，苦不堪言的訓練瀰漫著汗水與笑容，再生產球員身體能力與團隊默契。

教練帶隊的要領是拿捏競合關係，於持續無休的競爭中，培養球員合作精神。球員不僅競逐運動升遷機會，競爭更蔓延到熱身、體能、訓練和唱戰歌，透過競賽可發揮體能與訓練的趕工效果，遊戲能創造笑料活絡情誼。在競爭情境中製造合作，在遊戲輸贏間塑造和諧，更能掩飾訓練控制的實相。透過競賽遊戲，苦不堪言的青春期阿兵哥也是樂此不疲的運動戰士。

3. 追求超越打造苦練意識

培養原住民球員打球上癮和練習不休的運動心理，使其設法增強身體資本，更造就他們超越極限的苦練意識和規訓心態。

布農族 *Bisazu* 剛進球隊並不適應集中住宿制度，但棒球燃起他的希望：「我不知道怎麼講，就是很喜歡打球，然後就像毒品啊，就一天沒有碰的話就會很癢啊」(H1901:22)。阿美族 *Dolu* 則認為自己「中了就是要打棒球的毒」，像吸毒般會上癮，一天不碰就心癢手癢，解癮止癢之道就是打球。這點出球員的運動意志：場上練習雖辛苦，場下休息更痛苦。布農族 *Guang* 描繪他在場外休息的羨慕：「今天我感冒在旁邊看著學長跟同學練習，我好無聊喔也覺得沒練習手會癢癢的，我很怕別人

超越，所以明天我要把昨天沒練習到的帶到今天來練」(F-16[12])。休息會退步被超越，球員寧可練習不要休息。只要球員養成喜歡打球的習慣，毋須外力施壓也會設法練習。

然而，訓練如此辛苦，為什麼原住民球員會熱衷練習？釐清想練習不想休息的心態，可探究球員追求超越的運動心理機制。

一、強練型：不健康的球員逞能強練。阿美族捕手 *Shine* 被醫院檢驗出心肌擴大發炎之後仍投入訓練：「有一次我做完重量時，要慢跑二圈，結果跑一下就很喘了。我之前還可以跑20圈的ㄉㄟ」(A-10[17])。球員未必是健康身軀，遭遇到身體機能無法擔荷仍會試圖挑戰極限。

二、偷練型：受傷的球員設法偷練。即便受傷卻把醫囑當作耳邊風，更要求知情者隱瞞教練。以阿美族投手瘋狂鬥士為例：「這幾個禮拜練球右手手肘感覺到有點不怎麼舒服！這禮拜去看醫生他給我說，是手肘的韌帶撕裂受傷了！要過幾個月讓他癒合。拜託我不用練球喲」。受傷球員深怕減少練習進度落後，只好隱忍不發。

三、超練型：健康的球員期待練習、計較多寡、超限練習。想練和享練(享受練習被操)普遍可見。面對練習不以為苦，反倒擔憂訓練不足沒進步，球員計較的是少練，更形成討價式的訓練：「練習的時間很少，一下直就過了，我什麼也沒練到」(F-109[13])。甚至希望教練調整課表和順序以增加練習機會，或提出夜間練習和假日集訓：「星期六的練習對我們來說，是進步的原點，別的學校在放假，可是我們有練，就會變得很強」(F-109[13])。「如果一週休兩天的話，一個月就八天了，這樣要怎麼追上別人的腳步呢」(D-33[13])。趁其他隊伍或球員在休息，更要假日超練，找人到球場練投或練打保持球感、在宿舍鍛鍊體能或維修保養身體。甚至在學科下課時間或在家裡打報紙球、扁鉛罐球和保麗龍球，練習打擊的抓球靈敏度和跟球節奏。更有球員透過練體操和舉重強化體能，或在河裡練習阻力跑步。心之所繫是體能的強化，從而導致球員在身體資本的增能、儲值和折舊。

首先，球員會設法增加身體的能力。住在台東 *Tolik* 部落的阿美族 *Galansiyan*，曾代表臺灣取得 2009 年小馬聯盟小馬級世界青少棒冠軍。他的父親任職警察對兒子期望極高，會即時更新兒子在臺灣棒球維基館的資料。正值青春期的 *Galansiyan*，在高頻率的訓練中體重始終降不下來，身體負荷很重，但他仍強「忍」下來。

每天練完都四肢無力、肌肉酸痛，可是教練說：「這樣才對，如果沒有四肢無力、酸痛這就是摸魚」。放假爸爸都說：「如果你沒有吃苦你以後就國家敗類」。我不段的在練在努力使吃奶的力量還是沒有用可是我會努力。我爸說如果心裡、身體上沒有這個字，就忍一下就好了。(G-66, 73[12])

當下練習苦撐只為笑嚙未來甜蜜之果。唯有苦練才能成功，是球員心中最單純直接的功績主義看法，形塑出「辛苦練習是享有甜蜜果實的必經之路」的心理機制，自我說服練習辛苦實屬應然必然。為了跟學長一樣強，比隊友更進步，即便生病受傷也想參與苦練，這建構出凡事撐忍的苦練邏輯，就是練練練，究竟要練到什麼境界？球員希望「手備要多練，不要漏接，連一隻螞蟻都穿不過。打擊要練到無法形容的可怕，球來就能打安打。打擊練到都能打到球心。我要把球打好永不三振」(D-103, 104[13])。永遠都有進步的空間在前方，從而展出漫長無盡的訓練歷程。

其次，為身體資本儲值增強體能負荷量。訓練體能時，即便「氣喘吁吁、雙手無力支撐、肚子快要抽筋、挺在半空中的背和腰痠到快要斷掉、跑完體能好像石頭般動也不動」(均為球員用語)，球員反倒反省練得不夠才有如此身體反應，希望充實身體裝備，讓體能訓練轉化為甜蜜負荷。

自從做小肌肉的時後，有點酸。教練說把他想著以後會很甜，我就把他想成豐年果糖非常甜，結果睡覺起來不能洗臉，甚至想抓養，都要另一隻幫忙服住。可是時間的留逝以經過了一個月，手不在酸，直到練習傳接球，每顆球丟出去都是平的，讓我感覺我的裝備更新了。(D-31[13])

長肌肉是裝備更新，更是炫耀體格的象徵。只要撐過體能訓練，代表邁向進步。即使仍苦惱於運動升遷機會，但在艱辛練習中享受進步的喜悅，疲勞痛苦都是鍛鍊自我超越巔峰的捷徑，甜蜜的進步被包覆在辛苦練習之中。

最後，在超荷訓練下身體也會折舊和損耗性。適度鍛鍊讓體能更新加值，但身體並非機器零件，會充滿耗損的風險，此乃球員訓練日記中最常見的描繪。如：打tee三百顆手長水泡或破皮是必嚐之痛、「腳好像被鉛塊咬著都抬不起來」(B-20[16])。「快比賽前腰痛，恨不得把自己的腰砍斷」(A-8[17])。「我的手又酸又痛，感覺粗螞蟻在咬」(B-1[17])。「腰傷越來越嚴重。就連睡覺都會很痛」(B-41[16])。「手有時會痛，好像有針在扎我的手一樣」(A-69[17])。害怕退步和憂慮受傷，瀰漫在享受練習的球員心靈中。

學齡球員的運動傷害是個人疏忽或運動結構環境所致？例如：沒有傷害防護觀念的教練、課程、防護員。過去，在沒有隔場限制或球數限制下，造就一具具的受傷身體。越是少年得志的王牌，密集出賽同時造成高度可見性和受傷風險性。球員的傷痛因應之道是：先忍、再撐、逃避(痛會自動痊癒)、習慣(痛到變自然)、就診，但卻未必遵循醫囑，從而形成遍存的帶傷身體。

拖著傷痛身體勉強訓練會造成永久傷害，但球員既然受傷為何隱忍？第一、一日不練就會輸人，深怕他人進步自己退步。在場下看場上球員辛苦快樂的練習，內心更會百般煎熬。第二、怕被質疑偷懶裝

痛只好苦撐。擔憂被隊友取笑是無法忍痛的男子漢，甚至害怕在教練心中留下摸魚的壞印象，影響上場機會。

阿美族 *Namoh* 在 1999 年加入博愛少棒，當年比賽「就用力『催』這樣啊，丟到捕手的手套裡面」。一號先發投手的他，帶著疼痛手肘升上國中。

就是已經丟到麻痺了，就是痛到已經沒有差了。後來國二要升國三的時候就真的受不了了啊。骨科醫生就建議我說不要丟球，可是我想說怎麼可能不要丟球？不要丟球就是會退步啊。他說我的韌帶就是拉傷啊，所以現在手都歪掉啊。(H01：7-9)

兼任投捕的布農族 *Bisazu*，從小到大的傷害有手肘、腰和肋骨。某日練習賽，鎮守本壘遭遇到敵方衝撞，差點撞掉牙齒並造成嘴唇腫脹的 *Bisazu*，過幾天又再度受傷。當時他擊出三壘安打，「跑到三壘的時候，我的腰這邊就開始在痛。我媽去掛神經外科啊。我稍微做比較大的動作還會痛，好像被人敲打」(H1902：9)。無力負擔醫藥費的 *Bisazu*，知道病因卻無法醫治。而 *Mayaw* 在少棒階段曾是台東知名投手，膝痛拖延許久才開刀復健：

到國三快畢業已經連彎都不能彎了，不可以蹲連跑步都不能跑。忍到最後受不了了，痛到就是你走樓梯的時候，你要彎的時候會痛。我媽媽就帶我去那個國軍總醫院，他說是半月軟骨裂開。直到升高一才決定要處理腳傷，先休學然後就先開刀，結果在醫院待快一個月。(A0101：10-14)

原住民球員的俐落球技背後，含蘊著長久的訓練歷程、心理張力和身體苦痛。在高度競爭的壓力下，從事超越極限的體能導致身體的耗損。原住民球員自主訓練的運動觀及苦練求存的監管意識，致使教

練僅需低微的管理成本，即可讓球員養成自我剝削與規訓的苦練意識。

4. 作繭自縛的圓夢之球

在原住民球員所置身的訓練體制中，訓練控制的關鍵不是去技巧化(Braverman 1974)或隱藏與萃取剩餘價值(Burawoy 1979, 1985)，而是讓球員透過意識形態的監控與內化，自發性地極大化訓練量，競逐流動升遷的機會(包括：出賽或先發的機會結構、職棒球員空缺鏈的機會結構)。這同時完成「提升競賽效率的集體目標」及「球技升級或運動升遷的個人目標」，打造出球隊成績與球員實力，成就了球隊名聲和球員身價。

然而，原住民球員是否全心投入辛苦的練習？訓練過程的安排雖有意識形態的掩飾作用，但並不總被全然遵守。球場那麼大，球員那麼多，教練那麼少，球員未必竭力操練課表。多數時刻照表操課，偶有放風摸魚和佯裝認真，既達成訓練控制的效果又可彰顯主體的自由度。教練會讓渡出少數時刻球員擁有怠工權利以避免對立衝突，甚至藉機凸顯學長的位階和明星球員的身價。

即便多數球員在紅土上使勁力拼為圓夢之途鋪路。但限制產出也不時出現，例如：原本要打tee三百顆卻漏打或未盡全力打擊每顆球。甚至當教練到其他守備位置監工，位於監視雷達外的球員隨即降慢訓練力度，待聽聞教練聲音或接獲通報，才迅即恢復認真。忍痛偷練者不時存在，裝痛不練者存乎一心。摸魚者的常見藉口是口渴與如廁。打掃勞役更是逃逸訓練的快樂時光，球員會伺機放風尋樂。然而，到了賽季結束，苦無參賽機會的球員和未奪佳績的學長索性怠工，藉口看書卻自我放逐玩電動、打手機或看漫畫，逃避練習躲於球場看台上聊天或打盹。不過，越是不照表操課，手感生疏和體能驟降，越難以獲得運動升遷機會，更無法在職棒球員生產鏈中持續運轉，落入提前退場之局。

苦中作樂作繭自縛是勞動研究的傳神譬喻。艱辛的勞動者發展出

苦中尋樂的遊戲，生產了產品和社會關係，卻深化勞動者被宰制的地位，維繫勞動秩序和資本主義的再生產(謝國雄 1997:138)。旁人看來，原住民球員追求短暫職棒生涯，彷彿作繭自縛樂不思蜀。若從集體脈絡觀之，原住民優異的打球成就，致使打球成為部落族人的社交工具，強化社會連帶，深化族群形象的迷思，再生產特定族群文化的意識形態。當原住民職棒球員比例逐年攀升，原住民適合打球的自我實證預言和族群認同也將漸然成型。

六、紅土上的社會不平等

本文勾繪原住民成為棒球選手的社會流動和訓練體制，檢視原住民球員所座落的訓練軌跡、運動社會化、訓練過程的不確定性和意識形態的監管機制。自國小三年級開始的十幾年紅土歲月，在艱苦緊湊的訓練節奏下，原住民球員被鍛造成為青春期阿兵哥和紅土戰士。在邁入職棒勞動體制之前，不同教育階段的球場僅是暫時中介的訓練場，其不僅是球員習得運動專業化的所在，更是培養競爭求存心態和運動文化的競技場。然而，源自團隊運動和師徒制而來的綁樁與掙角，致使球員被綁架與分派到立基於教練人脈的下一個訓練場。

在運動社會化的養成過程中，原住民球員學習棒球文化中團結共享的群性慣習和階序互動邏輯，置身於苦難同當的連坐網絡。難以被標準化的訓練流程、無法估量的隱形產品、不確定的報酬，更養成球員儲值與折舊的體能觀念，形塑球員自主訓練的苦練意識和運動慣行。

原住民球員在進入職棒勞動體制之前，紅土球場中的訓練體制是必經之路，也是具體實踐升遷流動的競技場。訓練體制造成的效果有四：首先，冗長、緊繃而流動的競賽時空，導致球員遭遇課堂學習的斷裂化。其次，注重集體連帶的棒球運動，出賽機會與先發名單有限，形塑球員既競爭又合作的運動人格。第三，學長制、競賽遊戲和

空缺稀少性，打造球員的意識形態監管機制。最後，透過獨特的競賽遊戲與文化，原住民球員樂於苦練，擁抱高耗能、高風險、隱形不確定報酬的棒球運動，實踐自我剝削和規訓的苦練邏輯。

針對運動究竟是社會流動的墊腳石或絆腳石的既有觀點(Nabil 1980; Grey 1992; Houlston 1982; Leonard and Reyman 1988)，以及運動如何打造出社會不平等的說法(Sailes 1996; Hoberman 1997; Hartmann 2000; Cashmore 2005)，本研究援用社會流動的視野，考察打棒球的社會行動對原住民所產生的效果。棒球，為原住民球員注入一股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工作價值，它是扭轉社經弱勢處境的一支工具把手，既啟動了向上社會流動的機會，也轉轍進入其他的謀職選項。棒球，既是原住民攀升職棒殿堂的踏腳石，訓練過程中養成的先備身體能力和階序意識，更成為轉換到其他謀職範疇(如：職業軍人和體力工)的夢想階梯。然而，棒球的教育選擇也帶來分流機會和謀職選擇的絆腳石效應，被局限在特定的受教軌道和謀職選項之中。

直言之，原住民透過打棒球以便能有機會「打破」遭逢資本主義經濟邏輯侵蝕部落生活所帶來的生存機會不平等，但卻反倒藉由手中的機會之球，在競逐翻身階梯的過程中，「打出」謀職和社會分工的原／漢差異，建構出族群分工的階序、差異和互補圖像。亦即，原住民打棒球的社會行動，同時發揮了教育成為翻身階梯卻也構築出階層化藩籬的雙重效應。

從「族群」角度出發思考社會流動和訓練體制議題，仍存在許多運動社會學議題討論的困境和有待發展的領域，特別是原住民的文化特殊性和原漢之間的差異，如何在族群接觸和團隊運作中仍然持續發酵、匯通交流或隱然消逝。本研究透過原住民的棒球夢，解答台灣社會的一個謎題：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原住民為何樂於走向某些分殊化的謀職路徑？「被野球之神眷顧」的意象形塑，內化了「天賦的」運動細胞和打球基因的價值。對職棒選手的角色認同，以及保持苦練就會

成功的逐夢信念，建構出社會流動的圓夢階梯，更形成對此社會分派體系的效忠和投注。參與競逐流動的「選手」（無論在運動世界或社會世界），面對一系列的競爭淘汰過程與未來成功的不確定性，最終都會被新來的競爭者所取代，從而維持紅土場上與社會結構的存續。

紅土球場是一塊既充滿機會卻也帶來不平等的土地，它是一個同時交織著權力對立和階序互補的場域。社會不平等的常態須取得正當性才能維繫，關鍵是確保輸家和劣勢者對既有體制保持忠誠。訓練體制是催化階序意識形態和公平競爭原則的溫床，透過公平競爭法則的包裝，教育球員一種肯認社會不平等的心態，以及進入階序式社會結構的接受意識。訓練體制更是意識形態的角力場，成為球員經歷、回應、抵抗甚至肯認階序意識的場域。它灌輸打球作為社會流動管道的價值，更產生社會控制的效果。無論成功圓夢或夢想幻滅，功績主義和階序再製同時作用，夢圓與夢碎共同促成競逐流動是維繫社會運作的常軌。成功案例塑造社會流動的開放假象，對敗退者發揮社會控制的力量，模塑出其自我說服的心理機轉，提供社會不平等的解釋正當性。

當原住民成為職棒球員，至少造成三種社會效果：一、提供一種跨越不平等的機會。二、創造一幅生活困境逆轉勝的意象。三、打通一條翻身的社會流動軌道。然而，這也造成原住民（尤其是阿美族）彼此集中競爭的趨勢，成功案例強化族群認同，而球場上的優勝劣敗，更在行動者身上塑造出功績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意識形態，對敗退者發揮自我汰選的控制作用，維繫運動結構的運作。只要原住民秉持：社會公平開放、努力就會成功、苦練就能打職棒的信念，有助於產生自我勸說和面對失敗的心理機轉，並將圓夢希望寄託在隊友、族人或下一代的翻身，從而造成代間存續的繁衍趨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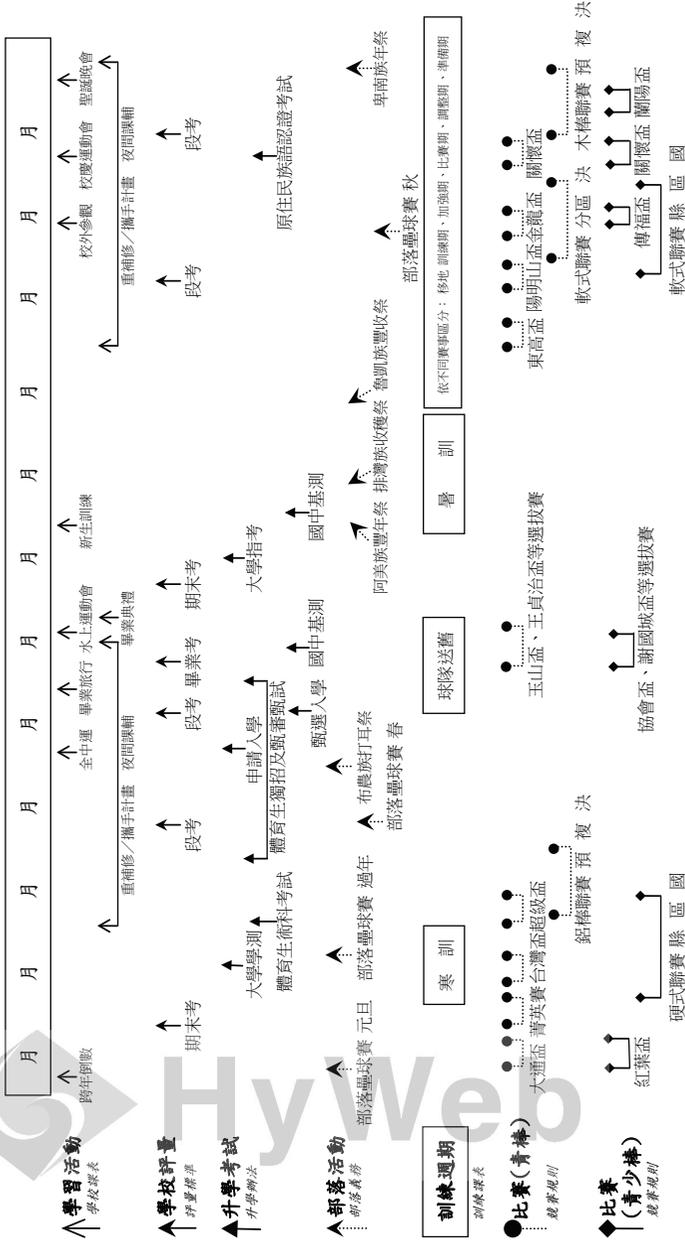
原住民透過打球打出流動機會至少需滿足三個要件：第一是可實現性，成功典範現身於大眾傳媒或周遭有圓夢個案，增強學齡球員成功打進職棒的信念。第二是可跨越的不平等，理性計算上運動成就比

學業成就的可及性高。第三是透過代間契約再生產原住民對打球的投注，帶來複製的困境或成功的翻身。

原住民將翻身機會投注在有限的職棒空缺，藉由看似公平競爭的汰選，原住民在紅土上的卓越成就，令社會流動的景象為大眾所見，更被下一代當作成功典範。在這條打出機會之路，打球被當作改善經濟和社會流動的階梯，通過層層關卡晉升到職棒舞台的球員，面對剝削和不對等的職棒勞動體制和職涯短暫的風險，持續向上流動的球員終將落入延遲到來的謀職困境。在表象上證成棒球作為原住民社會流動的開放機會，實際上卻是限量狹隘的流動管道，這促使社會分工圖像隱然成型，更刻劃出一種鮮明的社會形象：原住民喜愛追求且適合職棒工作。



(附錄) 原住民中學球員的打球年曆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 王甫昌(2003)《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北：群學。
- 王惠民(1994)《紅葉的故事》。台北：民生報。
- 中華職棒(2009)《職棒雜誌》(324期全)。
- 《民生報》(1991)〈蘭嶼少棒島〉。1月6日。
- (2004)〈探寶島尋才〉。12月5日。
- 瓦歷斯·諾幹(1994)〈體檢台灣「山胞教育」：台灣原住民教育體制的一些觀念問題〉，頁191-200。《原住民文化會議論文集》。台北：文建會。
- 甘允良(2010)《運動與男性氣概論述之研究：以台灣棒球的演進系譜為核心》。台北：台師大體育學系博士論文。
- 《自由時報》(2007)〈職棒球員41%原住民创新高〉。3月13日。
- 朱文增(2003)〈職棒選手薪資模型之研究〉。《第三屆中華民國運動與休閒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71-77。台北：台灣師範大學。
- 吳宗衡(2006)《台灣棒球運動中的原漢關係》。桃園：元智大學資訊社會學所碩士論文。
- 吳煜敏(2006)《花東原住民地區國民小學運動代表隊組訓現況調查研究》。台東：台東大學體育教學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 林仁義(2001)《原住民甲組成棒選手參與棒球運動動機之研究》。台北：文化大學運動教練所碩士論文。
- 林文蘭(2007a)〈1968，紅葉旋風！〉，刊載於「教育部生命教育學習網」時事評論(<http://life.edu.tw/>)。
- (2007b)〈金牌背後：原住民投身棒球運動的社會基礎與效應〉。見原民會編，《2007年台灣原住民族教育新思維》，頁3-1至3-28。台北：原民會。
- (2008a)〈原夢之球：紅葉40永不凋零！〉。《台灣原Young》27：42-53。
- (2008b)〈原／圓夢之球：台東棒球運動發展的歷史系譜考察(1895-2008)〉。見原民會編，《2008年台灣原住民族教育新思維》，頁1-2-1至1-2-24。台北：原民會。
- (2010)《棒球作為「原／圓夢階梯」：教育體制、文化創生與社會階序繁衍》。台北：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博士論文。
- (2011)〈棒球文化：紅土上的原住民文化展演和運動儀式〉。《文化研究》12：185-241。
- 林伯修、朱自敏(2009)〈花東學生棒球與原住民〉。《運動文化研究》9：67-108。
- 林炎嘯(1998)《不同角色對於原住民學童參與少棒運動影響之系統探討》。台北：文化大學運動教練所碩士論文。

- 林冠年(2010)《百年孤寂：台灣棒球發展之政治經濟分析》。台北：東吳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
- 林祖嘉、江澤明(2007)《球員表現、球員薪資、與產業結構調整：中華職棒的實證分析》，發表於2007年5月10日台大經濟系專題討論。
- 林琪雯(1995)《運動與政權維繫：解讀戰後台灣棒球發展史》。台北：台灣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
- 林華韋(2002)《職業棒球運動研究》。台北：體委會。
- 林華韋、林孜君編(2005)《典藏臺灣棒球史：嘉農棒球1928-2005》。台北：體委會。
- 邱韋誠(2003)《是鎖鏈還是羽翼：原住民棒球選手的運動之路》。花蓮：花蓮師院多元文化所碩士論文。
- (2006)〈運動與族群關係的再思考：社會、文化與差異〉。《大專體育學刊》8(4)：1-14。
- 邱韻竹(2008)《社會結構因素與原住民運動選擇之探討：以棒球運動為例》。桃園：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系碩士論文。
- 洪知俊(2008)《學長制在排球隊中的角色功能：以某大學男子排球隊為例》。台北：台師大運動與休閒管理所碩士論文。
- 洪偉欽(2007)《不同族群體適能相關基因之多型性研究》。台北：台師大體育學系博士論文。
- 范春源(1999)《原住民參與體育活動人口調查》。台北：體委會。
- 范萬宇(2007)《新竹縣原住民學生參與國民小學棒球聯賽之研究》。桃園：國立體院體育所碩士論文。
- 高正源(1994)《東昇的旭日：中華棒球發展史》。台北：民生報。
- (1995a)〈原住民與台灣棒球與台灣棒運(上)〉。《山海文化》9：32-36。
- (1995b)〈原住民與台灣棒球與台灣棒運(下)〉。《山海文化》10：26-30。
- 高永謀(2005)《曹錦輝瀾進大聯盟：力量與速度的美麗新世界》。台北：布克文化。
- 高克武(2011)《台灣棒球運動發展之研究：以台東馬蘭棒球隊為例(1965-1977)》。台中：台灣體院體育所碩士論文。
- 徐茜(2008)〈国外「体育参与」与「社会分层」关系的五大理论流派述评〉。《体育学刊》15(9)：31-35。
- 張力可(1999)《台灣棒球與認同：一個運動社會學的分析》。新竹：清華大學社人所碩士論文。
- (2000)〈全球化／在地化的辯證：九〇代台灣棒球場域的認同動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8：245-286。
- 梁淑玲(1993)《社會發展、權力與運動文化的形構：台灣棒球的社會、歷史、文化

- 分析(1892-1990)》。台北：政治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
- 郭振生(2009)《「國球」人口學：台、美、日棒球員數量與流動機會探討》。台北：輔仁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
- 陳嘉謀(2002)《台灣棒球運動發展之研究(1945-1968)》。台東：台東大學教育所碩士論文。
- 黃郁芳(2012)《做個好球員：台灣高中棒球培訓的觀察》。新竹：清華大學人類學所碩士論文。
- 楊照(1992)〈抽離了民族主義之後〉。《中國論壇》32(12)：37-40。
- 嘉農校友會(1993)《嘉農口述歷史》。嘉義：嘉農校友會。
- 蔡侑霖(2003)《競賽作為一種生產：台灣職業棒球產業勞動體制的初探》。台北：台灣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
- (2005)〈競賽作為一種生產：台灣職業棒球勞動過程的分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58：333-352。
- 蔡宗信(1991)《日據時代臺灣棒球運動發展過程之研究：以1895年至1926年為中心》。台北：台師大體育學系碩士論文。
- 《聯合報》(1995)〈南王國小，先天不足的勁旅〉。12月13日。
- (1998)〈全校壯丁皆球員〉。1月2日。
- (2007)〈十大高薪球員中原住民佔七位〉。3月19日。
- (2008)〈林岳平月薪30萬不是夢〉。12月21日。
- 謝仕淵、謝佳芬(2003)《台灣棒球一百年》。台北：果實。
- 謝柏宇(2011)《規訓與教化、挪用與整合到回應與翻轉：棒球與臺灣原住民》。花蓮：東華大學民發與社工所碩士論文。
- 謝國雄(1997)《純勞動：台灣勞動體制諸論》。台北：中研院社會所籌備處。
- 蘇國盛(2005)《中華職棒球員籌組工會之障礙研究》。台北：台師大運動與休閒管理所碩士論文。

西文部分

- Beamish, R.(1982) "Sport and the Logic of Capitalism." Pp. 141-197. in *Sport, Culture and the Modern State*. edited by Hart Cantelon and Richard S. Gruneau.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Bourdieu, P.(1984[1979])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1988) "Program for a Sociology of Sport." *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 5(2): 153-161.
- Bowles, S. and H. Gintis.(1976) *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 Educational Reform and the*

- Contradictions of Economic Life*. New York: Basic Books.
- Braddock, J. H.(1980) "Race, Sports, and Social Mobility: A Critical Review." *Sociological Symposium* 30(Spring): 18-38.
- Braverman,H.(1974) *Labour and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 Burawoy, M.(1979)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5)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Factory Regime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London: Verso.
- Carrington, B.(1986) "Social Mobility, Ethnicity and Sport."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7(1): 3-18.
- Cashmore, E.(2005) *Making Sense of Sports*. NY: Routledge.
- Chu, Wen-Tseng(2007) "Study on Current Status of the Retired Professional Baseball Players in Taiwan:With a Focus on the Trace Investigation of Retired Players." *Symposium of the Sixteenth Japan Sports Sociology Conference*. Kanazawa, Japan.
- Coakley, J.(2007) *Sports in Society: Issues and Controversies*. New York: McGraw Hill.
- Collins, R.(1971) "Functional and Conflict Theories of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6: 1002-1019.
- Dahrendorf, R.(1959)*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Davis, K. and W. E. Moore(1945) "Some Principles of Stratifi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0: 242-249.
- Durkheim, E.(1956) *Education and Soci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 (1977) "On Education and Society." Pp. 92-105 in *Power and Ideology in Education*, edited by J. Karabel and A.H. Halse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4[1893])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Edwards, H.(1973) *Sociology of Sport*. Illinois: The Dorsey Press.
- Eitzen, D.(1989) "Black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n Sport Since World War II." Pp. 300-312 in *Sport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An Anthology*, edited by D. S. Eitze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Eitzen, D.(2006) "The Path to Success?" Pp. 173-186 in *Fair and Foul: Beyond the Myths and Paradoxes of Sport*.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Eitzen, D. and Sage George(1993) *Sociology of North American Sport*. Madison WI: Rown & Benchmark.
- Fine, Gary Alan(1985) "Team Sports, Seasonal Histories, Significant Events: Little League Baseball and the Creation of Collective Meaning." *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 2(4): 299-313.

- (1987) *With the Boys: Little League Baseball and Preadolescent Cultur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oucault, M.(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Pantheon.
- Grey, M.(1992) "Sports and Immigrant, Minority and Anglo Relations in Garden City (Kansaa) High School." *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 9: 255-270.
- Hargreaves, J.(1992) "Sports and Socialism in Britain." *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 9: 131-153.
- Hartmann, D.(2000) "Rethin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ort and Race in American Culture: Golden Ghettos and Contested Terrain." *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 17(3): 229-253.
- Hoberman, J.(1997) *Darwin's Athletes: How Sport Has Damaged Black America and Preserved the Myth of Race*.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 Holt, R.(1989) *Sport and the British: A Modern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rne, J., Tomlinson, A. and Whannel, G.(1999)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Division in Sport." Pp. 95-128. in *Understanding Spor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ical and Cultural Analysis of Sport*. London: Routledge.
- Houlston, D. R.(1982) "The Occupational Mobility of Professional Athlete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port Sociology* 17(2): 15-26.
- Kane, M.(1971) "An Assessment of Black is Best." *Sports Illustrated* 34(January 18): 72-83.
- Klein, A. M.(1991) *Sugarball: the American Game, the Dominican Drea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Klissouras, V.(2001) "The Nature and Nurture of Human Performance." *European Journal of Sport Science* 1(2): 1-10.
- Lenski, G. E.(1966) *Power and Privilege: A Theory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 Leonard W. M.(1998)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of Sport*. Boston: Allyn & Bacon.
- Leonard, W. M. and J. E. Reyman(1988) "The Odds of Attaining Professional Athlete Status: Refining the Computations." *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 5(2): 162-169.
- Morris, A.(2004) "Baseball, History, the Local and the Global in Taiwan." Pp. 175-203 in *The Minor Arts of Daily Life: Popular Culture in Taiwan*. edited by Jordan, D., Morris, A. and Moskowit, 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Nabil, P. A.(1980) "The Present-Day Afro-American Major-League Baseball Player and Socioeconomic Mobility in American Society." *Review of Sport and Leisure* 5(2): 49-68.
- Nixon, H. L. II.(1993)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of Sport: Emphasizing Social Structure in Sport Sociology." *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 10(3): 315-321.
- Nixon, H. L. II. and J. H. Frey(1994) *A Sociology of Sport*. Californi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 Parsons, T.(1954) *Essay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Free Press.
- (1961) “The School Class as a Social System.” Pp. 434-455 in *Education, Economy and Society*. edited by Halsey, A. H., J. Floud and C. A. Anderson. New York: Free Press.
- Phillips, J.(1993) *Sociology of Sport*. Boston: Allyn & Bacon.
- Riess, S. A.(1980) “Sport and the American Dream: A Review Essay.”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14(2): 295-303.
- Rigauer, B.(1981) *Sport and Work*.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ailes, G. A.(1996) “Betting Against the Odds: An Overview of Black Sports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African American Studies* 2(2-3): 11-22.
- (2000) “The African American Athlete: Social Myths and Stereotypes.” Pp. 53-63. In *Racism in College Athletics: The African American Athlete's Experience*. edited by Brooks, D. and Althouse, R. Morgantown. WV: Fitnes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Semyonov, M.(1984) “Sport and Beyond: Ethnic Inequalities in Attainment.” *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 1(4): 358-365.
- (1986) “Occupational Mobility Through Sport: The Case of Israeli Soccer.”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 21(1): 23-33.
- Semyonov, M. and Yuchtman-Yaar, E.(1981) “Professional Sports as an Alternative Channel of Social Mobility.” *Sociological Inquiry* 51(1): 47-53.
- Sorokin, P.(1959) *Social and Cultural Mobili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Spreitzer, E. and Snyder, E.(1990) “Sports Within the Black Subculture: A Matter of Social Class or a Distinctive Subculture.” *Journal of Sport and Social Issues* 14: 48-58.
- Stebbins R.(1993) “Stacking in Professional American Football: Implications for the Canadian Game.”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 28: 65-73.
- Sundeen, J. T.(2001) “A Kid's Game? Little League Baseball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aiwan.” *Journal of Sport and Social Issues* 25(3): 251-265.
- Tatz, Colin M.(1995) *Obstacle Race: Aborigines in Sport*. Sydney: UNSW Press.
- Turner, R. H.(1960) “Sponsored and Contest Mobility and the School Syste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5(6): 855-866.
- Veblen, T.(1953) *The Theory of Leisure Class*. New York: Mentor.
- Wacquant, L. J. D.(1995) “The Pugilistic Point of View: How Boxers Think and Feel about Their Trade.” *Theory and Society* 24: 489-535.
- Weber, M.(1972) “The Rationalization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p. 240-248 in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edited & trans. by Gerth, H. H. and C. Wright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edited b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itnauer, W., Rogers, R. and Onge, J. S.(2007) “Major League Baseball Career Length in the 20th Century.”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26(4): 371-386.

Yu, Junwei(2007) *Playing in Isolation: A History of Baseball in Taiwan*.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